

第二章 戰後初期以教化為導向的文化建設

1945年（民國34年），二次世界大戰終結，臺灣的統治者再度更迭。在歷經日本50餘年的統治後，大多數臺灣人儘管歡欣鼓舞地面對回歸中國的時刻，但此時的臺灣人對祖國的語言文字、歷史與國情皆感陌生與隔閡，而在另一方面，戰後自大陸來臺人士也普遍抱持一種心態，認為臺灣同胞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受著「奴化教育」和「皇民化教育」，以致逐漸了脫離祖國的懷抱，固有文化幾乎消滅於無形。¹因此國民黨政府甫一接收臺灣，除了千頭萬緒的接收復員工作之外，亦積極地展開民族精神文化的改造運動，力求在短時間內將臺灣「中國化」。

為厲行「中國化」的文化政策，國民黨政府在40、50年代積極進行國語推行運動；1960年代以後，因海峽對岸的中共政權掀起文化大革命，在蔣中正總統登高一呼之下，臺灣開始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戰後初期的臺灣，處於戒嚴的威權體制之下，國民黨政府的文化政策，除了透過各縣市政府編制內的社會教育單位、國語推行委員會、民政單位、文獻委員會、圖書館與大眾傳播媒體深入民眾生活之外，更滲入龐大的學校教育體制，潛移默化地影響了臺灣人民的慣用語言與民族認同。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高雄市的文化建設幾都為了配合中央政策。儘管如此，文化霸權的形成需要依賴被統治者某種自願的贊同，不同的被統治者對於統治階級「一體適用」文化政策在接受度上仍會有所差異。高雄市身為南

¹ 何敬燁，〈目前臺灣教育幾個實際問題〉，《臺灣新生報》，1946年2月5日，第二版。轉引自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頁32。

部最大的都會城市，一方面具有都會地區才得以具備的廣大文化市場，一方面又遠離臺北執政核心，中央一元化文化政策在高雄市的實施方式與成效，表現其獨特的性格。

再者，受到教育、文化不分觀念的影響，高雄市朝野除了透過市內的學校教育機關與社會教育機構，執行中央交派下來的各項文化建設事務外，但其實更期盼一所綜合大學的出現。一所綜合大學，對高雄市民來說，除了能提供芸芸學子升學的管道，也是文化素養的象徵，因而掀起了長達數十年的爭取大學設校運動。尤其在 1970 年代後蒙上「文化沙漠」的惡名，高雄市更將其歸因於大學教育機構的缺乏，更冀求透過綜合大學的設立，洗刷污名，提振高雄市文化形象與內涵。戰後高雄市民爭取大學設置的活動，經過數十年屢仆屢起的奮鬥後才得以如願，使得高雄市爭取大學設置運動成為戰後高雄市文化建設史中為時最長也最為波瀾壯闊的篇章。

第一節 文化改造運動在高雄市

一、國語推行運動在高雄市

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推行國語運動的起源甚早。1945 年（民國 34 年）3 月，二次世界大戰尚在如火如荼進行中，臺灣省調查委員會已於重慶成立，並擬定〈臺灣接管計畫綱要〉，打算接收臺灣後，隨即展開國語的普及工作。戰後，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後，立刻透過傳播媒體、政府機關和教育機構積極展開國語文運動。

戰後初期推行國語運動的主導機構是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1945 年（民國 34 年）11 月，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務委員魏建功和專任委員何容帶著推行國語的相關法令、書籍和器材抵達臺灣，翌年 4 月 2 日正式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由魏建功擔任主任委員，何容任副主委，隸屬於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²根據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組織規程第十二條規定，為普遍推行國語，得在全省各縣市設置分會、工作站、推行所、講習所、調查所；因此，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尚在籌備階段時，就於 1946 年（民國 35 年）3 月先行成立縣市國語推行所 9 所，每所設推行員 3 至 7 人，在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指導下，辦理各縣市國語推行事宜。國語推行員之任務為傳習標準國語；解答國語疑問；協助各縣市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分會；協助政府推行政令；發布本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宣傳書刊；調查本省各縣市方言及流行之歌謠故事等。而自 1950 年（民國 39 年）以後，為提昇國語推行員專業人員

² 1947 年 5 月 16 日後，省國語通行委員會再度改組，改隸屬於臺灣省政府，並成為獨立機構。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54。

的形象，規定凡具有充任中等學校及國民學校教員資格，並經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考詢其國語知識技能合格給予證明者，方得任用。³

高雄市如同臺灣省各縣市一樣，戰火甫一停歇，旋即展開了國語推行運動。一開始除了有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所進行國語教學與教員訓練之外，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籌備處亦在高雄市辦理國語教學、教唱平劇等相關工作。⁴但由於民間對學習國語需求量甚大，因此軍隊與民間補習機構也投入了國語教學的工作。1951年（民國40年），高雄市成立國語推行工作站，站址設在三民示範國民學校，由在民間教育補習班致力推行國語多年並指導各校使用注音符號教學的陸水成負責辦理。⁵1953年（民國42年）夏天，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令國語推行委員張廣權至高雄市主持國語推行業務，高雄市國語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高市國語會」）正式成立。並如同其他縣市的國語推行委員會一般，由行政首長—市長兼任主任委員，市議會議長及教科長兼任副主任委員，聘請7名熱心國語教育人士擔任委員，訂定計畫，逐期辦理市內國民學校教師正音講習會及民眾教育補習班、教師講習會，授以教育教材教法以及注音符號教學法，展開巡迴各校研討國語正音的工作。⁶

此外，教育部自1954年（43學年度）起開始在全臺推動直接教學法。直接教學法為戰後政府當局最積極推動的國語教學法，係指當學童甫一入學，老師即用國語進行教學，藉此訓練學童國語聽、說能力。因實施後成果

³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58。

⁴ 許雪姬，《愛·希望與和平—二二八事件在高雄紀念專輯》（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1999），頁61。

⁵ 趙性源、王世慶、吳芝生、王憲華等編，《高雄市志·教育篇卷》（下）（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1962），頁218。

⁶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59。

良好，教育部敕令各縣市積極推行。⁷在此之前，高雄市各國民學校校長與教導人員已於 1952 年（民國 41 年）分別前往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之附屬國小，參觀國語直接教學法示範教學。高雄市光榮國民學校校長潘廷幹、教導靈小光，認為此教學法為國民學校推行國語之最好辦法，乃商得市政府教育科國語推行委員張廣權同意，積極籌備，先由光榮國民學校試辦，擬訂教材內容、設計各式教具並進行教學演練，於 1953 年（民國 42 年）9 月對一年級學生開始試行。教育科視察後認為效果極佳，責令該校舉辦觀摩會，計畫擴大實施。在準備工作完成後，1954 年（民國 43 年）夏天，高雄市配合教育部的命令，正式全面實施國語科直接教學法。⁸

除了教育部、廳主力推行的直接教學法之外，高雄市愛國國校校長王明德亦於 1957 年（民國 46 年）3 月創立王明德教學法。此法是一種將國校低年級國語科原來分開教學的讀書、說話、作文、寫字 4 個項目融合為一的「混合教學法」—以教科書的課文編成故事，利用實物或掛圖等教具指導學生觀察和討論，教師先從說話開始教起，兒童先學聽後再學講，藉此增加語彙。如此不僅能增進兒童說的能力，也能提高其作文能力、激發讀書興趣，減少寫字錯誤等。推出後，經高雄市前金國校試行效果良好，澎湖、高雄等多地陸續採用，獲得甚高的評價，成為當時重要的教學法之一。⁹

一般民眾的國語教學，則是透過社會教育的方式進行。高市國語委員會在高雄、軍中、鳳鳴等廣播電臺開設國語講座節目，除國語正音外，尚教授

⁷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105。

⁸ 趙性源、王世慶、吳芝生、王憲華 等編，《高雄市志·教育篇卷》（下），頁 218-221。

⁹ 當時重要的教學法除本文曾提及的直接教學法及王明德教學法外，另還有張廣權發明的魏軾及戴硯弢教學法。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56、106。

民眾課本及古文。另外還在市立圖書館內設立一間國語文補習班，提供民眾學習國語的管道。¹⁰當時亦有民間產業團體注意到市民國語學習的需要，為會員辦理相關的研習活動，例如 1951 年（民國 40 年）高雄市漁會從 9 月 24 日開始，每晚 8 時至 10 時，在旗津辦事處開辦漁民語文講習班，聘請吳朱絃女士擔任講師，指導會員學習國語，為期兩個月。該會並決定在旗津辦事處舉辦後，以輪流方式，亦在中洲、連雅、¹¹援中各辦事處，繼續舉行該項講習班。¹²

平心而論，戰後國民黨政府積極地展開國語推行運動，除了在意識型態上認為國語文的學習可使臺灣人「中國化」之外，亦有施政上的實際需要。戰後初期的臺灣人民，平日使用語言多以各族群的母語和日語為主，大部份人不懂中國「國語」—北京話。而由大陸來臺的人士同樣也多不解臺灣人平日使用的語言，這樣一來，不但造成戰後臺灣行政效率大受影響，臺省人士與大陸來臺人士也隔閡衝突時起。因此，藉由國語推行運動，讓臺胞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因而「明白中國的內情，接受中國的文化，參與中國的政治」，¹³成為戰後國民黨政府的迫切目標。

臺灣民眾對於學習國語一事，也不盡然都持排斥的態度；尤其在戰後初期，初回「祖國」懷抱的喜悅，一度還在臺灣引發學習國語的風潮。政府推行國語的工作尚未正式展開，臺灣人即自發性地展開「祖國」語文的傳習運

¹⁰ 趙性源、王世慶、吳芝生、王憲華 等編，《高雄市志·教育篇卷》（下），頁 218、165。

¹¹ 舊名苓雅寮，1946 年取其「連續幽雅」之意，更名為「連雅」。1952 年元旦，經市議會決議，復名為苓雅。

¹² 《聯合報》，1951 年 9 月 24 日，第五版。

¹³ 《臺灣新生報》，1946 年 1 月 27 日，第二版。轉印自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32-35。

動。不過，語言的轉換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對成年人而言，在忙於營生之餘，尚要另撥時間學習新的語言，實在很難在短時間內達到效果。但國民黨政府此時卻採用了躁進的作法，1946年（民國35年）8月，決定自是年10月25日起廢除臺灣境內所有新聞紙雜誌之日文版，接著各族群的母語也成了被抑制的對象，讓原本以日語和母語為生活用語的臺灣民眾驟然失去了溝通的語文，甚至被迫變成了「文盲」。此外，師資的不良、二二八事件的爆發、來臺官員不願意學習並歧視臺語的心態，亦斷傷了不少臺灣民眾學習國語的熱情，因此有人甚而決心徹底抵制政府所大力推行的國語運動，堅持只講「臺灣話」而從不講一句國語。¹⁴

除了部分文人的自覺外，地方的民意機構也成為反對國民黨政府一元化語言政策的大本營。1952年（民國41年）省教育廳和新聞處以推行國語為由，禁止電影院任用臺語通譯，¹⁵剝奪不懂國語的民眾享受傳播娛樂的機會，不少地方議員皆發難反對此項政策。¹⁶基隆市6家戲院就聯合向市議會請願，要求暫緩此項禁令，市議會還投票通過了此項請願案。¹⁷

高雄市的民意機構也發生類似的反彈。如1952年（民國41年）2月高雄市議員林澄增、陳武璋在議會中指責民政科指導里民大會力量不夠，認為應該派懂臺語的高級官員前往指導，才能發揮里民大會應有的成效。¹⁸又如1956年（民國45年）3月，高雄市議會舉行第四次大會時，通曉臺語、日語

¹⁴ 如日治時期作家張文環因為這個緣故，於戰後不但不願寫作，連北京話及中文都不屑於學習和閱讀。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43-44、136-138。

¹⁵ 《聯合報》，1952年6月21日，第二版。

¹⁶ 《聯合報》，1952年6月21日，第二版。

¹⁷ 《聯合報》，1953年3月13日，第四版。

¹⁸ 《聯合報》，1952年2月22日，第五版。

及國語的謝掙強市長（1951/05/01~1957/06/01）¹⁹用國語作施政報告，遭到李順德議員要求用臺語翻譯一次，並指出日本「領臺」50年也用翻譯，何以現在不用翻譯？其他議員呼應李順德議員的說法，甚至連會說國語的李源棧議員也認為大部分議員不懂國語，市府應該把報告的重要部分譯為臺語。遭到議員們圍剿的謝市長不敢堅持政府的國語推行政策，只好承諾會把施政報告印成文字後分送給各議員參閱，才免去了重述一遍的麻煩。²⁰

1960年代高雄市政壇的另一則小故事，則是表現了高雄市多語並陳的情形。出身於高雄市、畢業於日本應慶大學，曾連任高雄市省轄市時期第四、五屆民選市長的陳啓川（1960/06/02~1968/06/01），本身並不懂國語，卻因擔任市長一職而兼任國語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在某次議會中，遭到六〇兵工廠出身的市議員蘇慶芬質詢其身為國語會主任委員，卻不懂國語，如此要如何推動國語時，愠然答道：「蘇議員，你說的是什麼國語？」引發議會全場哄堂大笑，因為蘇議員鄉音很重，說的是一口「廣東國語」，如此還來質疑他人的國語能力，自然難獲支持。²¹從這則故事中也可以反映出國民黨政府強制性的國語推行政策所存在的兩大弊病：第一、地方政府國語推行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不一定具備基礎的國語能力；第二、國語推行政策在臺灣籍人士與大陸來臺人士間存在著差別待遇。

就第一點而論，以一位不懂國語的人擔任國語委員會的主委，乍看之下

¹⁹ 謝掙強為高雄市省轄市時期第一、二任民選市長，臺灣省澎湖縣人，日本應慶大學肄業3年，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十八期畢業，曾任國民黨政府軍委會政治部臺灣義勇隊駐渝辦事處主任、中央設計局臺灣調查委員會專員、臺灣新竹州接管處委員會委員、嘉義市長、臺灣省防禦司令部參調等職務。從其學經歷來看，謝氏應懂得臺灣語、日語及國語。《聯合報》，1954年5月4日，第四版。

²⁰ 《聯合報》，1956年3月17日，第五版。

²¹ 曾小傑，《港都政壇故事多》（高雄，著者自版，2000），頁50。

確實令人錯愕。但這樣的情形在戰後臺灣文化政策的推行層面上，並不是個罕見的現象。²²由此推知，戰後初期文化建設的推行，主要的憑藉實為政治力量，文化僅是政治的附庸而已。如此一來，是否會影響文化工作的實施成效，並降低政府推行此項政策的說服力，似乎並不是為政者的主要考量。

在第二點方面，戰後初期的臺灣，嚴格來說，能說一口標準國語的人其實僅佔了一小部分。客家人和閩南人使用客家語和閩南語，原住民使用各族的語言，而三百萬到四百萬左右的外省人，則使用著源自大陸各地的方言，南腔北調，並不一致。但國民黨政府的國語推行政策，卻僅針對臺灣省籍的民眾而施行，甚至把國語文能力作為政府機關、銀行、公營事業單位、醫院及學校等機構升遷考核的項目。²³

而來自中國各省的人民，並非人人都能說一口標準國語，甚至大部分外省籍人士都帶有濃厚的鄉音鄉調，卻不用受〈臺灣省公私立小學加強推行國語注意事項〉等法規的約束，反能繼續擔任教師或官員的職務。屬於外省籍的《國語日報》的主編何凡²⁴曾言：「實際上臺胞的國語程度，早已在其他省分同胞之上。你聽一聽，現在初中或小學高年級臺灣學生的話，就知道比所

²² 例如 1952 年（民國 41 年）春，臺灣省及各縣市普遍修志，高雄市即設立高市文獻會以董其事，主任委員一職如同國語委員會一樣，是由市長兼任，在市長不必然受過史學訓練的情況下，卻能擔任著文獻會主委的職務。毛一波、曾迺順、杜賢達 編纂，《高雄市志·概述篇》（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1956），頁序 1。

²³ 1946 年（民國 35 年）行政院長官公署頒佈的〈臺灣省三十五學年度小學教員暑期訓練實施辦法〉中規定，師院畢業生國語、國文、歷史考核不合格者，即取消其任教資格；1949 年（民國 38 年）起，省教育廳實施師範院校國語國文畢業考。1951 年（民國 40 年）7 月 10 日省教育廳責令各級學校聘請教員時，應考慮其國語程度，如國語程度太差者，不予聘用。1963 年（民國 52 年）7 月 22 日教育廳再頒〈臺灣省公私立小學加強推行國語注意事項〉，國語能力成為校長考核老師年終考績之一。這些政策迫使許多臺灣人為保職務而不得不面對強大的語言學習壓力。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46、114、139。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下）（臺北，玉山出版社，1999），頁 14-15。

²⁴ 本名夏承楹。

謂『湖南國語』、『四川國語』之類正確的多了。」²⁵ 1950年代，亦有不少臺灣籍的民意代表反應，許多外省籍人士，操著濃重的方音，卻不在國語推行運動的矯正之列，實在不甚合理。但這些呼籲不分省籍一律推行國語的聲音，並未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重視。²⁶於是臺灣人民為求得一份公職或教職，戰戰兢兢學習著國語，卻看到外省籍人士依舊說著一口方言口音，自然滿懷差別待遇的忿恨。高雄市議員蘇慶芬議員不反省自身的國語程度，反質疑陳市長的國語能力，因此遭市長反唇相譏與同僚訕笑之辱，正是當時臺灣人民不滿國民黨政府不公平的國語政策下的情緒表現。

國民黨政府除了忽視部分外省籍人士國語程度不及臺灣籍民眾的事實外，其施行的一元化語言政策，單向要求臺灣人學習國語，卻不平等地要求大陸各省來臺人士學習臺語，亦讓臺灣民眾為之憤懣不已。不過，由於戰後初期臺灣已普遍實施各項民意代表與公職人員的選舉，因此多數臺灣人也許無法直接反抗政府，但還是能透過選票來表達心中的不滿。這一點從早期每逢中央或地方選舉時，政見發表會頓成「臺語演講會」中得到例證。只要是黨外，又是講臺語的候選人所舉辦的政見公聽會總是能吸引大批的聽眾，有些選民甚至以「誰講最好的臺語就必當選」為投票標準。「講臺語」因此成爲一種「意識認同」，甚至是抵抗政府語言歧視的手段。因此當時的臺灣出現了一種矛盾的現象，如果一個臺灣人堅持只講臺語，在戒嚴時代的臺灣官僚體系裡，不可能佔到任何位置；然而同一個人，改到基層從事選舉，就會發現不講臺語很難拉到選票。政府一元化的語言政策所造成統治階級與民間社會

²⁵ 何凡，〈國語比賽〉，《聯合報》，1954年11月12日，第六版。

²⁶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87-88。

的族群間的緊張顯而易見，而對國家認同的歧異，更成為政治變革的重要潛在動因。1970年代以後，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擴大開放更多的選舉來擴大民意基礎，讓這樣的趨勢益加明顯，黨外勢力為與國民黨提倡的國語有所區別並凸顯本土性質，往往以閩南語作為集會時唯一的語言。²⁷發生在高雄市的「美麗島事件」即是明顯的例子。

1979年（民國68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的黨外人士於高雄市新興圓環舉行紀念大會，提出了「解嚴、開放黨禁」，「廢除萬年國代、國會全面改選」等訴求。因事先未得治安單位許可，且吸引了數以萬計、情緒亢奮的群眾前來參加，場面變得難以控制，終而釀成警民衝突，爆發了震驚海內外的「美麗島事件」。²⁸這場事件發生之後，擁護國民黨政府的人士紛紛激烈指責，批判參與民眾為「暴民」、「匪徒」，且黨外人士以「閩南語」為號召反對政府推行「北京話」的主張，顯有有強烈的「臺獨」色彩。立委穆超就發表了一篇書面質詢，厲聲指責「臺獨」人士以「提倡閩南語，打擊國語，阻礙國語普及，語言的統一，造成分裂的局面」。²⁹

「美麗島事件」是臺灣民主發展史上一個個悲愴的時刻，同時也是一個激動熱情時代的序幕。它是民主運動史的一個重要分水嶺，亦是黨外勢力匯聚的契機。《美麗島》雜誌社實創刊於臺北，黨外人士也來自全國各地，因在中泰賓館的開幕酒會以及在各地設立服務處時，均遭人破壞挑釁而發生大大小小的衝突，《美麗島》雜誌社乃決定於1979年（民國68年）的國際人權日，

²⁷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139、152-153。

²⁸ 李筱峰，《臺灣史100件大事》（下），頁112-113。

²⁹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94。

在高雄市舉行「人權大會」和示威遊行，卻不幸引發憾事。³⁰「美麗島事件」會發生在高雄市實有其偶然性，並不能以此認定高雄市為黨外勢力的重鎮。但從民眾參與的熱情讓警總南區司令常持琇迫於情勢，同意讓集會在未取得許可的情形下照常舉行這一點看來，還是可以推知黨外運動在南部人士心中的影響力。這股影響力，除了反映臺灣民眾在長期戒嚴下，對於民主憲政的渴盼外，閩南語對基層民眾的魅力，無疑也是重要因素。

但儘管國語政策並未能普遍獲得社會民眾的認同，戰後初期的國語政策卻仍是藉著深入學校教育體系而改變了臺灣人民的語言習慣。³¹1946年（民國35年）2月行政長官公署即下令各級學校一律使用國語。³²1952年（民國41年）省教育廳訂定〈臺灣省國民學校加強國語教育辦法〉，規定國民學校應舉辦各項國語教育活動，如注音朗讀、講故事、演說綴句、作文等競賽，並利用朝會、週會時間令兒童作報告或講演。³³1963年（民國52年）7月22日教育廳頒行的〈臺灣省公私立小學加強推行國語注意事項〉中，規定以學生說不說「國語」作為操行成績評量的一項標準。³⁴

國語能力還成為學子獎懲的標準之一。成年的臺灣民眾或許可以抗拒學習國語，民意代表或民選市長也可以將國語政策下繼續使用著母語或日語，但對於戰後的新生代而言，只要接受國民教育，勢必就要面臨國語的學習，

³⁰ 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下），頁 112-113。

³¹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們，因擔憂孩子上學之後聽不懂老師說的話而影響課業表現，於是從孩子小時候就教他國語，反無意願傳授母語給下一代，無形中造就了許多「國語家庭」。有些家長更是為孩子訂閱了《國語日報》，課餘後還送孩子去民間補習班或國語日報社附設的作文班，藉以增強子女的國語文能力。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126-127、146。

³²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44。

³³ 《聯合報》，1952 年 12 月 2 日，第三版。

³⁴ 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下），頁 15。

而且學習的效果更是直接關係到其學業成就和升學機會。限用國語的規定還從校內延伸到校外，高雄市中等學校校外指導生活委員會早在 1952 年（民國 41 年）5 月 24 日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中，就經決定修正通過高市中等學校學生校外生活公約及統一獎懲辦法，第四點提到學生在校外也要說國語。³⁵爲了要讓學生養成說國語的習慣，學校教師們無不費盡心思，採取強硬措施，有的學校製作「請使用國語」、「我不該說方言」的牌子，遇有說方言的同學便掛在他脖子上，作爲處罰。³⁶因爲在校內外說母語而遭羞辱、罰錢、責罵，是政府遷臺後至解嚴這段時期入學接受國民教育的本臺灣省籍學童難以抹滅的共同記憶。

在 1956 年（民國 45 年）後高雄市國語推行委員會工作告一段落。³⁷但是國語仍在學校中繼續扮演著強勢語言的角色。

根據高雄市政府在 1990 年代進行的調查研究發現，高雄市在學的學子，無論是閩南人或客家人，大部分已以國語爲主要的使用語言，母語有漸被取代之勢，且多數的高雄市民無論是閩南人或客家人，一般除了自己的母語外，也都能講國語。這樣的結果證實了國語推行運動的成效。但也有研究指出，戰後臺灣以中央政府所在地的臺北地區，民眾較常說國語，其他縣市的民眾日常生活中說方言的情形仍很普遍，尤以中、南部地區爲然。³⁸高雄市的街頭巷尾確實時常見到各族群的市民以母語交談的畫面。甚至高雄地區的外省

³⁵ 《聯合報》，1952 年 5 月 26 日，第六版。

³⁶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108、146

³⁷ 趙性源、王世慶、吳芝生、王憲華 等編，《高雄市志·教育篇卷》（下），頁 219。其他縣市甚至在 1959 年（民國 48 年）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併入教育廳後，紛紛將國語推行委員會裁撤或改組併入縣市政府教育科、局內，讓功能原已不彰的縣市國語推行委員會更是雪上加霜。

³⁸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132-134、140。

籍人士雖然以國語為主要使用語言，但也多能講或懂一些閩南話，而第二代外省籍人士除了會講國語以外，也多能講流利的閩南語。高雄市民雙語的現象非常普遍。³⁹

國語推行運動，在臺北之所以能夠較其他城鎮更為成功，一方面是因為它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各項文化建設的重要實施區域，多項文化工作多由臺北作起；有些政策甚至在離開臺北後因成效不彰或經費問題而草草收場，因此造就了臺北成為臺灣「中國化」文化政策實施成果的典範，也因此擁有比其他縣市更多的國語人口。⁴⁰另一方面，這也與戰後初期文化、教育不分的情形有關。因教育與文化不分，兩者共享一定的預算，在戰後各項經費皆告窘迫的情況下，各縣市政府「教育文化之支出預算」花在國民學校的硬體設施和人事費用後已所剩無幾，迫使文化建設常淪至邊陲角落，甚至陷入「無米可炊」的困境。與國語推行運動有關的文化建設支出即歸屬在比例最低的「社會教育及其他經費」之下，這也就是為什麼當省政府裁併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時，各縣市政府旋即起而效尤之因。

由於社會教育受限於經費的不足而遭遇到極大的困難，自然影響了對社會大眾國語推行的成效。如在高雄市，1952年（民國41年）高雄市年度教育文化之支出預算為9,725,104元，已達到憲法規定教育文化需佔總預算35%的標準，但用在中學、國校及幼稚園的因增校增班而產生的硬體費用上後以

³⁹ 曾玉昆、李三榮 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八·風俗語言篇》（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1997），頁159。

⁴⁰ 以國語推行運動為例，戰後初期臺北市因得地利之便，有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就近支援而得以開辦語文專修班來訓練教師的國語文能力，其他各縣市則限於人力物力，大多只能利用暑期開辦教員講習班調訓中小學教員，時間很短，效果有限。當時在桃園龍潭教書的作家鍾肇政先生，只好利用每天下午，跟一位從臺北補習班補習回來的人學注音符號。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72-73。

所剩無幾。⁴¹1959年時(民國58年)高雄市全年歲入經費約8千5百萬元至9千萬元,教育文化經費仍是佔35%,其中中等教育佔教育文化經費的20%;國民教育為70%;社會教育及其他經費約10%。⁴²學生在學校接受了國語教育之後,離開學校仍然是面對著廣大的臺語社會,尤其是出身農工家庭子女平時在家時以母語和家人交談的比例比出身軍公教家庭的學生為高。⁴³高雄市為一工業城市,六成以上的市民為勞工階級,如此一來,自不免影響了國語的普及程度,亦是高雄市在強大的國語政策下卻形成雙語社會的重要因素。此外,高雄市雖在戰後雖也曾因外省人士移入而人口大幅上升,⁴⁴但多以軍人為主,集中於左楠、獅甲、小港的眷村裡,⁴⁵自成一片天地,不像臺北一樣散居在各行各業裡。如此一來,應會影響到國語散佈的程度。正因為如此,儘管經過長達40多年獨尊國語的政策,早已經改變了臺灣人以往的習慣用語,但與臺北市相較,在高雄市,母語顯然具有較高度的影響力,許多民眾平日交談時多喜國、母語夾雜,展現了多元化的語言活力。

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高雄市

1966年(民國55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⁴⁶。國民黨政府一方面為

⁴¹ 《聯合報》，1952年2月2日，第五版。

⁴² 《聯合報》，1959年1月27日，第三版。

⁴³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133。

⁴⁴ 陳震東，《高雄市人口變遷之研究》（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1988），頁25。

⁴⁵ 鄭水萍，〈興盛與契機—高雄市歷任市長簡史〉，《高雄畫刊》1999特刊，頁36。

⁴⁶ 1949年中國共產黨將國民黨政府逐出中國大陸後，開始實施共產主義制度，在文化導向上即採取不同於與國民黨政府所主張孔、孟儒家思想為中心的路線，對中國傳統多採批判立場。1966年更是爆發了「文化大革命」，以「破四舊、立四新」為題，大肆打破儒家觀點的思考模式與破壞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不僅國際社會為之震驚，也促使臺灣的國民黨政府發起「文化復興運動」，主張要以中華文化「匡救國際上的文化逆流的共產邪說」。「文化大革命」於1976年時落幕。施志輝，《「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研究（1966~1991）》，（國立臺灣

宣示其代表中華文化的正統地位，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這一點在臺灣日趨提倡本土化的過程中尤然。

1966年（民國55年）11月12日，總統蔣中正在臺北市陽明山中山樓落成典禮上，發表〈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紀念文〉，闡述「三民主義」與「中華文化」的關係，並對民眾發出呼籲，希望以此紀念孫逸仙建築物落成作為「復興中華文化明德新民之契機」。參加典禮的全體人士聯合簽名，發起建議，促請政府接受並呈請總統明令頒佈，規定每年孫中山誕辰為「中華文化復興節」。為了整合這股力量、發動普遍的宣傳，國民黨中央於12月邀請各界領導人士，共同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復會」）籌備處，以加強國內、國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工作的聯繫，為復興中華文化作持久的努力。1967年（民國56年）7月28日上午10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發起人暨成立大會」於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舉行，在6百多個與會人士的見證下，文復會正式宣告成立，並由總統蔣中正擔任會長。⁴⁷

文復會秘書長谷鳳翔曾向蔣中正請示該組織的性質。谷氏表示當時的團體，不外乎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但蔣氏表示兩者皆非，認為文復會為「結合政府有關機構與社會文化團體」的「社運機構」，當時的籌備處主任謝然之也在成立大會上說明該會既不是普通民眾團體，也不是普通學術團體，而是一種社會運動的推行機構，包括政府各部門、學校、社團，乃至每一家庭，是「全國性大家都來參加」的，不須普通社團的權利義務。⁴⁸至於該會的經

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頁12-20。

⁴⁷ 施志輝，《「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研究（1966-1991）》，頁12-22。

⁴⁸ 蕭阿勤，《國民黨政權的文化與道德論述（1934-1991）—知識社會學的分析》（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頁100。

費來源，文復會希望接受社會團體或私人企業的捐助，或者募款及孳息，但「政府也可以補助」。⁴⁹而事實上文復會幾乎不曾募集到任何私人或民間團體的捐款，所以向由教育部編列預算來支應。⁵⁰

換句話說，文復會並非政府機關，但有了國民黨政府的強力支持，還是能透過教育機構深入校園。文復會所力推的「國民生活須知」、「國民禮儀範例」納入了小學的「生活與倫理」、中學的「公民與道德」的正式課程之中，各級學校亦紛紛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支會來承辦文復會交派的諸項事務，如舉辦「國民生活須知」、「國民禮儀範例」相關主題的壁報及論文比賽等，期以透過教育的力量，達到文復運動深入生活的目的。⁵¹

1970年代，在文復運動推動之下，臺灣各縣市掀起設立「忠烈祠」、「孔廟」之風。高雄市在1973年（民國62年）捲入了這項風潮，王玉雲市長（1973/02/01~1981/6/21）主政下的高雄市政府發起重建高雄市忠烈祠計畫，翌年正式動工，拆除了1929年（昭和4年）所興建的日式「金刀比羅」神社，⁵²仿臺北國軍忠烈祠，採中國式宮殿式建築建制，重新修築建立高雄市忠烈祠。1978（民國67年）正式竣工，新建的忠烈祠包含正殿、前殿、山門、牌坊、迴廊及革命先烈士蹟館等，由高雄市文獻委員會負責管理。每逢春秋二祭地方首長來此主持祭典。⁵³

⁴⁹ 施志輝，《「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研究（1966-1991）》，頁25-26。

⁵⁰ 蕭阿勤，《國民黨政權的文化與道德論述（1934-1991）—知識社會學的分析》，頁102。

⁵¹ 施志輝，《「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研究（1966-1991）》，頁125-126。

⁵² 「金刀比羅神社」是供奉海上守護之神，所以都出現在一些仰賴海上交通、漁業發展的地方，像高雄、基隆、蘇澳等地都曾有過金刀比羅神社。金刀比羅神社是祭祀海神的，所以它所在的位置會和一般神社稍有不同：它大都是蓋在能夠望見大港的山上。就像當初高雄壽山上的神社面對著高雄港，基隆神社可眺望基隆港，而蘇澳的金刀比羅神社則面向蘇澳港。〈我的赤腳旅行，2006.10.3〉網站。網址：http://www.wretch.cc/blog/barefoot&article_id=5911716。

⁵³ 《高雄市政七年》（高雄，高雄市政府，1981），頁195-197。

除忠烈祠外，1973年（民國62年）高雄市政府有鑑於舊有孔廟侷促一隅及頹廢不堪，僅存的崇聖祠又不足以代表孔廟，為響應復興中華文化運動，選擇蓮池潭北岸建新孔子廟，其結構採取宋制，主要院落採傳統形制，繞以迴廊，以壯觀瞻，並名為「高雄孔子廟」，為當時臺灣最大的孔廟。⁵⁴落成之後，每年教師節舉辦的祭孔大典轉往此處舉行。

高雄市在1979年（民國68年）7月升格為直轄市時，文復會高雄分會同步成立，共在市內132個國中小學設立了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支會，負責推動文化復興運動的相關業務。⁵⁵

在學校教育之外，為使文復運動進入一般的市民生活之中，高雄市文復會亦在市內的3個社教機構、11個行政區域成立文復會支會，例如市立圖書館自1979年（民國68年）11月3日起開辦四書、論語、國畫、中國結等研習班，傳承中國傳統文化與藝術。⁵⁶市府還編印了文言白話對照的《新譯論語讀本》30萬冊，免費分送市民每一家戶一冊，還分送各級學校、公共圖書館、旅館等，期使市民與一般旅客均能普遍閱讀。⁵⁷另外，市府教育局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高雄市分會，自1980年（民國69年）起定期辦理「文化講座」及「中山學術講座」，邀請學者專家講述中華文化等相關課題。⁵⁸

雖然與國語推行運動相同，文復運動擁有政府的強力支持，並經由教育

⁵⁴ 蔣忠益、曾玉昆 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九·文化志·文獻、名勝古蹟篇》（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1997），頁150。

⁵⁵ 「高雄市政專輯」編輯委員會，《高雄市政改制十週年紀念專輯》（上）（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1990），頁732。

⁵⁶ 「高雄市政專輯」編輯委員會，《高雄市政改制十週年紀念專輯》（上），頁732。

⁵⁷ 洪昭祥、林淑娟 編，《高雄市歷任市長對議會施政報告彙編》（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1989），頁46。

⁵⁸ 黃金池 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七·教育志·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體育篇》（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1994），頁334。

機構，滲入民眾的生活。但文復運動並未能如國語運動一般，改變臺灣人的生活習慣，反而在推行之初，就引發了眾多的批評。彭歌就曾批評文復會「這個機構既無法定的權責，又缺乏由下而上的群眾基礎，推行工作就很難紮根，加以預算有限，除了維持處理日常事務的人員之外，出了一本月刊，實際負責的各位先生已經盡到了力量，但因為組織本身的性格與權責不夠明確，績效如何令人難以做過高期待。」另外，由於「委員的平均年齡偏高，20位常務委員中，70歲以下者不多，而他們本身工作太忙」，多半難出席各項會議。⁵⁹何凡也在失望之餘為文譏諷：「為了文化復興，錢花了不少，大人先生的言論也聽了不少，但是腳踏實地為復興工作作一點事情的人還真不多，因為太實際了，不適合我們這個喊口號的社會，……」⁶⁰文復運動的成效可見一斑。

從高雄市來看文復運動，也能發現不少文復運動流於「空泛」的弊病。例如為文復運動而重建的忠烈祠在完成後，除了春秋二祭地方首長來此主持祭典時會熱鬧一番外，平日館前十分冷清，僅置技工、工友各一人，每日僅司清潔環境工作及看守門戶而已。⁶¹反而是祠前方的庭院大樹成蔭，又可遠眺海景，而祠後方的小徑清幽靜謐，為登山尋幽賞景的市民提供了休憩的處所而較有人氣，時時可見三五長者與青年情侶漫步其間。矛盾的是，為除去日本殖民痕跡，提倡中華文化的忠烈祠，卻在主殿後方的小徑上與前方的庭院保留了可看到日式石燈籠改造而成的座椅；而日治時代用來紀念「大東亞戰爭」的碑塔也依舊屹立，只是換上了國民政府的梅花標記而已。⁶²

⁵⁹ 彭歌，〈文化戰的司令部〉，《聯合報》，1971年12月3日，第九版。彭歌，〈農復會式的文復會〉，《聯合報》，1971年12月4日，第九版。

⁶⁰ 何凡，〈書展南下〉，《聯合報》，1970年5月5日，第九版。

⁶¹ 《高雄市政七年》，頁195-197。

⁶² 〈神社之旅：高雄的神社與忠烈祠〉網站。網址：

另外，高雄市孔子廟的興建是當時全國創建孔廟運動的一部份，當然不離中華文化復興的目的，但是高雄市政府在進行整建工作的設計時，所關懷的並不僅是文化復興的意義而已，亦相當重視此建築完成之後所來帶來的觀光效應。孔子廟的興建處，就位於蓮池潭畔，水光山色，向來是高雄市著名的風景名勝。1960年代以後，高雄市名勝愛河臭名遠播，蓮池潭成為市政府主力推動的新興觀光景點，為招徠遊客，在興建孔子廟之時，即決定以水景為孔廟增色，將文昌祠、明倫堂、書院巒門等附屬建築，部份建於水上，並設有迴廊與彫石欄杆之橋樑，供民眾行走其上時可細細賞玩潭景之用，並在潭旁空地布置庭院遊客休憩之用。⁶³此時的孔廟雖顯然想脫去古時孔廟的肅穆氣氛，展現新時代的親民作風。

大體而言，文復運動主要推行的 1960、70 年代，與大力國語推行運動 1940、50 年代相較，國民黨政府的威權性已隨著國內外政治局勢的變化出現了鬆動的現象。加上經濟的繁榮，民眾教育與生活水準的提高，觀光的風氣慢慢成形，對於政府的文化政策，不是懷疑其不合時宜，⁶⁴因而無法引發太多共鳴；就是用觀光加以包裝，以文化復興之名，行旅遊休憩之實。文化復興運動於是就在目標口號化與文復會空殼化的情況下，悄悄地走向了尾聲。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4/hoshinoruri/godweb/index.html>。

⁶³ 《高雄市政七年》，頁 187。

⁶⁴ 例如文復運動就遭不少知識份子批評其為復古之運動。

第二節 爭取大學設校運動

對於中央政府強力推行，由上而下的各項「文化改造」運動，如國語推行運動、文化復興運動，高雄市政府身為下級單位，必須在可能的範圍內執行中央交派的各項文化事務；但除此之外，高雄市朝野顯然更關心在大高雄地區設置綜合大學的課題。在戰後多所大學決定設校地點的過程中，常可以看到高雄市政府與地方精英努力爭取、出錢出力出地的身影，但直至 1980 年（民國 69 年），離終戰 35 年之後，身為第二大都市的高雄市，才在中央政府平衡南北教育資源的考量下，有了第一所綜合大學的成立。

早期的大學教育確實有獨厚大臺北地區與中部地區的現象，南部學子開學前與逢年過節擠爆火車站與長途客運車站的場景年年上演。教育資源不公平的分配，造成了區域發展的失衡，也或多或少讓高雄市蒙上了「文化沙漠」、「暴發戶」等污名，對高雄市的文化發展了造成深遠的影響。

一、戰後大學教育的「重北輕南」

大學教育屬於高等教育的一部份，以為國家培養經濟發展、研究推廣所需的高階專業人才為教學目標，因此國家往往會依據自身的發展現況，制定符合本國需求的大學教育政策。⁶⁵

⁶⁵ 學者指出，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可分成三大類型：就學率 15% 以內稱為菁英型（elite），此類型的大學教育主要是為了培養社會領導人才與專業人員而設立。15% 至 50% 則稱為大眾型（mass），主要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民眾開始強烈要求教育機會的均等，而國家也迫切需要能適應社會多元需求的人才，因此提高大學教育的員額。超過 50% 稱為普及型（universal），在此階段的國家全民不分年齡都有接受高等教育教育的機會與權利，高等教育的功能也被定位為培養符合高度產業需求與社會變化的國民郭俊銘，《政府遷臺後我國高等教育政策演變之研究》（國立暨南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10、23-24。

國民黨政府遷臺（1949年，民國38年）以前，由於內戰方殷，無暇顧及臺灣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遷臺之後，又以穩定政局為首要考量，僅消極地同意一些原設於中國大陸地區的學校來臺復校，罕見新校的成立。直到1960年代以後，隨著臺灣經濟起飛，帶動了社會上對各種產業人才的需求，在國家經費與經濟發展的考量下，政府決定大量增設專科學校，並開放私人興學。惟因發展過速，卻也造成少數大專院校師資不良、設備不足、濫竽充數的問題。因此到了1973年（民國62年）以後，政府採取緊縮政策，強調「重質不重量」的發展方針，高等教育發展的速度乃大幅下滑。⁶⁶

在高等教育整頓與停滯時期，有學者回顧成長時期大學院校的設置情形，發現有不少的缺失，除了師資、設備引發討論之外，學者針對區域失衡的問題也提出了批評。密西根州立大學博士，美國賓州州立愛丁堡大學地理系主任周春堤表示，「大學教育不是狹義的職業教育，……，而是明是非、辨真偽、潔心性、知取捨、益群體、愛國家的品格教育、觀念教育和專長教育的總和。它應該是以普遍化為原則，均益化為宗旨，國用化為依歸」，在1978年1月20日《聯合報》之社論中，他提出對大學教育之建議，其中包括了大學的區域分佈問題：

國立大學及學院，不屬於財團法人，而是全國納稅人所共有，所以它們的設立地點應著重：區域的特性、地方的開發、人口的分佈、地理的均衡四點。今天在臺北的國立院校有：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師範大學、陽明醫學院、技術學院、中興大學法商學院、交通大學管理研究所及運輸工程研究所等7校。從都市地理學上看，中壢和新竹都

⁶⁶ 郭俊銘，《政府遷臺後我國高等教育政策演變之研究》，頁58-67。

是大臺北的一環，所以中壢的中央大學、新竹的交通大學、清華大學都可以納入臺北學術系統，大臺北以外，只有臺中的中興大學和臺南的成功大學而已。大臺北區佔了十分之八，其餘地區只佔了十分之二，這種極不平衡的畸形分佈，需要立即拿出魄力予以糾正。⁶⁷

周氏此番論說反映了臺灣的大學教育資源，尤其是國立大學嚴重集中於北部的現象，這也正是南部民眾發出「重北輕南」之嘆的主要因素。

二、高雄市設置綜合大學運動

1950年代至1980年代，高雄市爭取高等教育機構在高雄市設置的運動可說是前仆後繼，屢敗屢起。茲依各校倡議建立的時間先後分誌如下：

（一）、爭取設立私立東海大學：

如前所述，戰後初期由於政局的不安與經濟的困頓，中央政府對於高等教育機構的設置作為十分消極。除了一些日治時代原已成立而戰後接收改制的教育機構，如臺灣大學（臺北，1945年改制設立）、省立師範學院（臺北，1946年改制設立）、省立農學院（臺中，1946年改制設立）、省立工學院（臺南，1946年改制設立）之外，各地只能期盼中國大陸大學來臺復校時藉以爭取大學教育資源。但此類的復校活動，仍會加重國家的財政負擔，因此在面對復校案的提出時，中央政府多持保留的態度。

1952年（民國41年），過去在中國大陸曾襄助13所基督教的美國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表示有意在臺灣創辦大學，藉以延續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

⁶⁷ 周春堤，〈改進大學教育的五點建議〉，《聯合報》，1978年1月20日，第二版。

消息一經傳出，各縣市政府如同久旱逢甘霖，無不使出全力極力爭取。⁶⁸臺南市議會即表示，臺南為民族英雄發祥地，文物風采，素為全國之冠，且民風淳厚，氣候適宜，基督教徒甚多，教風至盛，實為基督教大學設立之優良地點，所以一致議決通過，呼籲該大學設立臺南市，並將全案送臺南市政府，責其向有關當局提出陳情。⁶⁹

高雄市對於爭取基督教會大學來高雄市設校一事反應亦甚積極。1952(民國 41 年)年高雄市議會作出緊急動議，爭取美國基督教會大學來高雄市設立的議案，獲得議長及全體議員一致通過。⁷⁰6 月 26、27 日高雄市各界代表包括市長謝掙強、市議長林仁和、副議長陳玉波、社會名流陳啓川、高市漁會理事長陳牛苞、議會主任秘書蔡景軾先後相繼抵達省政府，會同高雄市籍省議員何傳、黃堯等向省垣各有關機關陳情，以 4 大理由建議將基督教會擬在臺灣成立之大學設立於高雄市：(一)高市為臺灣省南部要港，工業發達，交通便利，與高屏兩縣形成人文地理之一單元。本屆高中畢業生高屏二縣市，逾 1300 餘人；南部省立工學院於本學年度招生不過百餘名，遠赴臺北投考大學，消耗財力精神極感不便，且大學錄取名額亦有限，故高屏 3 縣市近千高中畢業生失去深造機會。(二)高市大埤湖地區遼闊，風景優美，交通便利，由市區乘公共汽車 15 分鐘可達，由大埤湖至鳳山步行 20 分鐘可達，故該地實為設置大學之良好校址。⁷¹(三)建校地基市府可無條件撥給。(四)修建

⁶⁸ 東海大學〈東海沿革〉網站。網址：

http://www.thu.edu.tw/1_chinese/1_about/2_history/1_rough.html。

⁶⁹ 《聯合報》，1952 年 7 月 9 日，第六版。

⁷⁰ 《聯合報》，1952 年 6 月 22 日，第六版。

⁷¹ 大埤湖即大貝湖，1964 年後易名為澄清湖。此風景區雖位於高雄縣轄區內，但與高雄市實只有一路之隔，由於毗鄰市區，風景秀麗，成為高雄地方人士理想中的大學校地，甚至在劉翔擔任高雄市長期間（1949/5~1950/4），就曾提出要將此風景區畫為文化區，爭取大學設

校舍及教室費用倘有不足，高市當發動社會人士捐募。⁷²從議會表決到高雄市各界人士快速採取行動並願意供應建校所需要的經費與土地一事看來，高雄市當時對於大學設校一事十分熱切。

由於臺灣各界對基督教會大學的熱情反應，甚至因競爭激烈而謠言四起。⁷³為防亂象叢生，1953年（民國42年）6月，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代表葛蘭漢博士（Dr. Thomas W. Graham）與執行長范威廉（Dr. William P. Fenn）雙雙來臺，正式展開籌備設校的準備事宜。⁷⁴關於成立大學的法令程序，早在1952年（民國41年）范威廉來臺拜會教育部長程天放時已獲得程氏的首肯，⁷⁵原則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所以最讓設校者為難的，即是選擇校地一事。由於許多縣市都以提供校地與建校經費作為招徠大學前來設校的條件，讓大學籌備處人員陷入難以抉擇的泥淖中，因此光在勘查校地方面就花去不少時間。

1953年（民國42年）6月15日，在高雄市省市議員聯席座談會中，市議員再度向省議員提出「爭取基督教大學設立於大埤湖附近，以利南部青年盡量進修最高學府之機會」的建議案。⁷⁶但夾在各縣市極力爭取的呼聲中，

置的主張。李正中，〈劉翔先生傳稿補記之一（一）〉，《高雄文獻》第13期，1983年1月，頁108。

⁷² 《聯合報》，1952年6月28日，第六版。

⁷³ 1953年（民國42年）3月2日，《聯合報》上的一則新聞引起了關心設立基督教會大學案的人士注意，一位自稱為美國基督教長老會中國佈道事業主持人的牧師梅文，於2月底來到臺灣視察教務，在他離去之時，指稱由美國各教會聯合辦理的基督教教會大學，將於今年秋季正式在台設立，校址已選定臺南，且其規模將與燕京大學相仿。梅文牧師還說，今年暑期後在桃園縣中壢鎮還要再設立一所由美國教會私人辦理的基督教會大學。此則新聞一經刊登，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即出面否定了此項說法，梅文牧師為何許人也成為未竟之謎。《聯合報》，1953年3月2日，第三版。

⁷⁴ 《聯合報》，1953年6月12日，第三版。

⁷⁵ 《聯合報》，1952年7月29日，第六版。

⁷⁶ 《聯合報》，1953年6月16日，第四版。

顯然未能獲得教育部及中國基督教大學籌備處的認同。基督教大學籌備處與董事會在多方考量之後，最後決定將該校設於臺中市大度山區，並定名為東海大學。⁷⁷高雄市的爭取終無結果。

而就在高雄市議會爭取設置基督教會大學的同時，臺灣省政府也正在考慮新設一所省立水產專科學校。1952年（民國41年）6月26、27日高雄市各界代表亦紛紛北上，向省府爭取該校的設立，並提出了6項理由：（一）高市向以漁業為生產大宗，惟以漁業技術人才缺乏，漁船漁具及捕撈方式仍沿舊規，欲求振興漁業，需先從水產教育做起。（二）高市雖已有水產職業學校，但受學制、設備、經費等所限，培育之人才僅係中等幹部。（三）高市為本省南部第一漁港，為南部漁獲物唯一集散港口，遠洋漁業如菲律賓之蘇祿海、西利俾斯海等漁產豐富，宜為開發南洋漁業之南進基地。（四）高市漁船漁民及漁獲量居全省各縣市之冠，高屏3縣市漁民總數達11萬餘人，市內漁業種類繁多，製造漁業設備之工廠齊備。（五）水產學校校址問題得由高市地方提供適當土地作為校址，必要時並由地方籌措開辦費及設備費之一部。（六）日治時期不在本省設水產專科學校為對本省水產教育之輕視。水產專校的設立不僅能有貢獻於今日臺灣，反攻大陸後對國家貢獻尤大。⁷⁸但到了1953年（民國42年），省府決將水產專科學校設於基隆，並擴大為海事專科學校，定名為臺灣省立海事專科學校，⁷⁹仍然無視於高雄港貨運、漁獲量遠高於基隆港

⁷⁷ 臺中市長楊基先接受《聯合報》的專訪時表示，基督教大學能得創設中市，是文化城無上的光榮，中市除了提供百甲土地作為校地之外，也願盡可能予以協助建校事宜。1955年（民國44年），該大學正式招收第一批學生。〈東海大學〉網站。網址：http://www.thu.edu.tw/1_chinese/1_about/2_history/1_rough.html。《聯合報》，1953年6月27日，第四版。

⁷⁸ 《聯合報》，1952年6月28日，第六版。

⁷⁹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網站。網址：<http://www.ntou.edu.tw/include2/perspective.php>。

之事實。高雄市高等教育設校行動再度鍛羽。直到 1967 年（民國 57 年），省府才將高雄市高級水產職業學校升格，改制為「臺灣省立高雄海事專科學校」。

（二）、設立私立高雄醫學院

在向省府與中央爭取設置高等教育學府卻飽受失望與打擊的時刻，高雄市內部的設校運動也正積極醞釀中，最後終於促成高雄市第一所高等教育學府—私立高雄醫學院的設立。這所醫學院的創立源於杜聰明的設校計劃。杜聰明為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在醫學界素有令名，曾任臺灣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之院長一職。1954 年（民國 43 年）離開臺大醫院及臺灣熱帶醫學研究所之後，與臺灣省醫師、牙醫師、藥劑師等同業 136 名於臺北發起創辦瀛洲醫學院的計畫。⁸⁰根據該計劃畫，原本欲在北部尋覓設校地點，不料卻困難重重。高雄人士聽聞醫界名人杜聰明有意設校卻遭逢阻礙，遂積極與其洽商，在地方名流陳啓川同意捐地 11 甲作為校地，高雄市議會通過撥款補助議案的熱烈支持下，杜聰明於是揮別臺北，南下高雄市，與高雄市地方人士共同規劃高雄醫學院的設立事宜。⁸¹是年 7 月 21 日，董事會成立，推舉陳啓川為董事長，聘杜聰明擔任院長，校名定為私立高雄醫學院，校址設在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 月 16 日，南部地方首長、社會名流出席高雄市史上第一所大學院校的開學典禮，可說冠蓋雲集。在場者除了南部地區各領域的社會菁英之外，還有 61 名醫科一年級新生與 20 名教師。

高雄醫學院草創初期，校舍未興，還必須借用愛國國小大禮堂作為臨時校舍，而當時十全路一帶全是水田，四顧茫茫。高雄醫學院就是建立在這樣

⁸⁰ 趙性源、王世慶、吳芝生、王憲華 等編，《高雄市志·教育篇卷》（上）（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1961），頁 160。

⁸¹ 《聯合報》，1954 年 7 月 12 日，第四版。

的一片窪地上。⁸²但這並無損於高雄醫學院在高雄市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它不僅是南部第一間，臺灣第三所培養優秀醫藥人才的最高學府，⁸³亦是戰後在國家財政困難下，由民間人士興學以抒解民眾旺盛的進修需求的首例。

高雄醫學院能在當時文教資源貧乏的高雄市成長茁壯，杜聰明與陳啓川兩人首居其功。沒有杜聰明的學識與醫界人脈，高雄醫學院的創立就不會那麼順利地進行，杜氏在臺北遭遇的挫折，卻反而為高雄市帶來了突破現狀的機會；但若沒有陳啓川的慨捐私人用地，高雄市也就失去吸引杜聰明南下的誘因。陳氏為高雄醫學院所作的並不限於個人財力的支援而已，籌備初期，不停奔走於教育部與省府之間，取得了建校的認可，加上其在南部聲望素隆，由他率先投入高醫的建校工作，即刻帶動了其他熱心教育的地方人士響應，均表竭力協助，踴躍獻地捐資。⁸⁴於是在高雄市朝野群策群力的耕耘下，從籌建至立校不到一年的時間，高雄醫學院就得以順利的誕生。高醫的設立，不僅背負著培育高雄優秀子弟成為醫界人才的責任，也擔任了振興地方文化的角色。

不過，以一所規模不大的醫學院，想要振興自從日治時代以來即被定位為「工業城市」、「軍事要地」的高雄文化，恐怕是力有未逮。故從高雄醫學院建立初期，院方和地方人士就不以「醫學院」為滿足，而是將其視為朝向綜合大學發展之起點，終點則是要成立至少包括 4 個學院的「高雄大學」，院長杜聰明對此尤為積極。1960 年（民國 49 年）5 月 21 日在高雄市召開的臺

⁸² 李琦懿，〈高雄醫學院〉，《高雄畫刊》第 8 卷第 3 期，1987 年 3 月，頁 29。

⁸³ 前兩所分別是臺灣大學醫學院、國防醫學院。

⁸⁴ 《聯合報》，1954 年 7 月 26 日，第四版。

灣醫學會第七屆地方醫學會，身兼此會理事長一職的杜聰明博士即在開幕儀式中報告他創辦高雄大學的計畫。他說：高雄大學已選定岡山為校址，將先設 3 個學院，包括現在的高雄醫學院，以及理學院和農學院，將來還要增設工學院、文學院和商學院。⁸⁵而隔年出版的《高雄市志·教育卷》中對於高雄醫學院的記載也提到高雄醫學院「將來擬增設理學院、文學院、商學院，以完成高雄大學。」⁸⁶但 1963 年（民國 52 年）以後，高雄醫學院設立的兩大推手—杜聰明與陳啓川，卻因高醫的財務、人事、權力、法理 4 項問題以及意氣之爭開始交惡。⁸⁷兩人及其支持人馬持續多年的惡鬥甚至驚動了央府與省府，紛紛派員前來關心並加以排解，何應欽、蔡培火、楊肇嘉、連震東等都一度加入調停的行列。⁸⁸最後杜聰明被迫辭去了院長的職務，雖然繼續在高醫任職，但影響力顯不如昔。而將高雄醫學院擴充為「高雄大學」的願景，也隨著杜氏的失勢而未能實現。

（三）、爭取設立國立清華大學

1954 年（民國 43 年），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校址選在當時為臺北縣轄區內的木柵地區。⁸⁹同年 10 月，政府核准私立東吳大學的復校案，人文薈萃的臺北外雙溪地區成了東吳大學在臺的新校地。⁹⁰1955 年（民國 44 年），有鑑於軍事國防科技的需求，中央政府宣布同意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在臺復校。⁹¹該校校長梅貽琦自海外返臺後宣稱：研究所的地點可能在臺

⁸⁵ 《聯合報》，1960 年 5 月 22 日，第二版。

⁸⁶ 趙性源、王世慶、吳芝生、王憲華 等編，《高雄市志·教育篇卷》（上），頁 160。

⁸⁷ 《聯合報》，1963 年 5 月 26 日，第三版。

⁸⁸ 《聯合報》，1964 年 2 月 6 日，第三版。

⁸⁹ 《聯合報》，1954 年 9 月 12 日，第三版。

⁹⁰ 《聯合報》，1954 年 10 月 17 日，第三版。

⁹¹ 《聯合報》，1955 年 9 月 28 日，第五版。

北附近，距離臺灣大學與市區不要太遠，以便與臺灣大學取得聯繫，同時為將來自行製造同位素以後，可停供醫、工、農各方面的研究。⁹²梅氏的說法引起了臺北縣與北市毗連之各鄉鎮，如板橋鎮民眾之關心，紛紛表示歡迎該校設置於該鄉鎮內。⁹³但與臺北數百公里之遠的臺中市、彰化縣、臺南市、高雄市亦未放棄此次機會，先後表示願意出錢出地，加入爭取之列，梅氏也只好展開清華大學復校勘址的全臺之旅。⁹⁴該年年底，清華大學一如梅氏最初所願，正式選定離臺北不遠的新竹市復校。⁹⁵又是「一市歡欣有名校為其增輝，多市卻為落選而暗自傷心」的結果。

由以上諸校在臺復校的情形看來，當時高等教育資源已呈高度集中的現象，雖然 1954 年（民國 43 年）10 月，教育部訂定〈申設私立大學院校及專科學校審核原則〉，要求私立大學（或專科）院校的設立地點應在臺北市以外之縣市，⁹⁶儼然已注意到高等教育資源過於集中臺北的現象。但當時復學的學校多數為公立大學，並不受此原則之限制；私立大學，即使不能設立於臺北市之內，也多以臺北市近郊為復校校址。畢竟在 1950 年代的臺灣，除了首善之地臺北之外，其餘各地仍是農村生活型態，生活機能不佳，資訊與交通流通皆亦甚為不便；而高等教育除了傳遞知識之外，還負有研究高深學術的責任，若設立在偏遠之地，尋找資料不便，自然會加深研究學問的困難度。而且 1950 年代的前半期，中央與省府機構皆設立在臺北市內，高等教育機構受這兩層體制的教育部門管轄，彼此公文往返密切，若能設於臺北附近，不

⁹² 《聯合報》，1955 年 11 月 14 日，第三版。

⁹³ 《聯合報》，1955 年 11 月 15 日，第五版。

⁹⁴ 《聯合報》，1955 年 12 月 3 日，第三版。

⁹⁵ 《聯合報》，1955 年 12 月 18 日，第五版。

⁹⁶ 《聯合報》，1954 年 10 月 17 日，第三版。

但可以增加辦事效率，也可免去舟車勞頓之苦。等教育學府傾向集中於臺北，其原因並不難想像。

(四)、省立高雄女子師範院校的設立

遠離臺北生活圈的高雄市，要爭取學校設立，實在困難重重。不過，高雄市也非在每次設校競爭之中都落下陣來；相反地，高雄市初次勝利來得很早，就發生在 1953 年（民國 42 年）。該年，省府教育廳多次公開表示從 43 學年度（1954 年）起將增設一所省立女子師範，惟地址尚未決定。雖說師範學校在當時僅是中等教育機構，但其就學期間的公費補助及畢業後的就職保障，依舊吸引了不少學子的青睞。如此一來，自然又引起各縣市一場混亂的爭奪戰。

高雄市第二屆市議會會議期間，市議員乃提出「建議省政府教育廳長，明年度將設立之女子師範院校，應設立於本市，以利女子教育案」。⁹⁷但嘉義縣對於爭取省立女子師範院校亦頗為積極，該縣教育科長熊茂生就指出嘉義縣市區範圍比起競爭對手彰化、雲林、臺南等縣為大，主張將該女子師範設置在嘉義縣。⁹⁸群雄相爭的結果，最後由高雄市勝出。女子師範學校遂於 1954 年（民國 42 年）在高雄市創立。一年多以後，嘉、雲兩縣又爲了爭取省立師範學校的設立互不相讓。

關於省府對設校地點的決定標準，當時頗引起輿論的非議。1956 年（民國 45 年）3 月，《聯合報》的一篇新聞評論就批評省府在考量重大建設設置地點時，不就該地的人文、自然背景去考量其適宜程度，反而都是先放出一

⁹⁷ 吳春富，〈高雄市議會今昔談〉，《高雄文獻》第 1、2 期合刊，1979 年 12 月，頁 289。

⁹⁸ 《聯合報》，1953 年 11 月 26 日，第四版。

股空氣，讓地方上大家來爭，然後再看那塊地方「肥」，那個縣市有「貢獻」，才來做最後決定。文末並不滿地指出高雄市之所以能爭得女子師範院校，即是在財力上佔了優勢的結果。⁹⁹

的確，身為日治末期工業發展中心與擁有全臺第一大港的優越條件下，產業的發展與港工捐的挹注使高雄市的財政比起臺北市之外的農業縣市顯然充裕許多。¹⁰⁰這樣一來，在戰後初期為爭取大學設立必須出錢出力出地的情況下，高雄市實比其他縣市多了一些優勢與勝算。但從歷年來高雄市屢次爭取設校，卻失敗多於成功的現象來看，可知財力的雄厚與否並非中央與省府決定新校校址落在何處的唯一考量。在爭取學校設立的奮戰過程中，高雄市用來爭取教育資源的財力反而成為當地人士的痛。一方面因為依恃財力爭得來的學府，雖然滿足了居民的進修需求，但卻遭到其他落敗縣市人士的譏評，使高雄市蒙上「暴發戶」之污名，而在另一方面，建校時出錢出地從不落人後，高雄市的高等教育資源依舊遠遜於臺北、臺中、臺南等同為省轄市之城市，這也使得高雄市民繼續處在「文化沙漠」的陰影之下，自怨自艾長達數十年之久。

1965年（民國54年），省府為儲備未來實施志願升學方案後龐大的中學師資需求，決定利用高雄女子師範學校現有基礎改制設立省立高雄師範學

⁹⁹ 《聯合報》，1956年3月14日，第五版。

¹⁰⁰ 港工捐為港口一項為數可觀的財源之一，此項捐款自1947年起開始徵收，由本省進出口貨物中，抽捐貨值的15‰。當時全部撥歸港務局，作為建設港灣之用。後經基、高兩市爭取的結果，乃自1950年1月1日起，增收至20‰，其中四分之一劃歸市府作為市政建設經費，對兩港市政裨益甚多。惟自1951年1月1日起，省府把全部港工捐納入省庫，統籌統支之後，兩港市的財政即陷入困境。但到了1956年，省府同意依照1947年原比例分配給基隆市與高雄市。此項分配的辦法是「按前年度當地港工捐實收數四分之一的比例，由該市自行列入該市預算，本府（指省府）按仍實收數核撥補助。如有超收時，仍按照四分之一的比例分配撥助。」。《聯合報》，1955年12月9日，第五版。

院，培養國文、英語、數學等科目的中等教師。¹⁰¹1967年（民國56年）8月女子師範學校正式升格，成為高雄市繼私立高雄醫學院之後的第二所獨立學院，更名為「省立高雄師範學院」。1980年（民國69年）7月1日，因應教育政策的調整，再度更名為「國立高雄師範學院」，至1989年（民國78年）升格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五）、爭取設立國立成功大學高雄校區

成功大學的前身為省立工學院，1956年（民國45年）升格為大學，是1980年（民國69年）國立中山大學在西子灣復校之前，南部地區唯一的國立綜合大學。

成功大學的升格改制也曾是高雄市府與熱心教育人士關注的話題。1954年（民國44年）底，南部各縣市長、議長及省議員在臺南集議，決定成立臺灣省立工學院籌設國立成功大學促進委員會，希望省府、教育部准核該校自1955年（民國44年）度起改制為國立成功大學，並增設管理學院及商學院。至於基金籌措問題，南部各縣市政府願自行負擔，地方教育人士亦樂於協助。¹⁰²但並未得到省府的支持。1955年3月7日高雄市籍省議員林仁和及臺南縣籍省議員胡丙申等人針對高等教育資源過度集中於北部的情形提出質詢，省主席嚴家淦雖然同意「大學不宜集中於臺北」，但還是以「政府對於設立綜合大學須慎重處理，與其有許多有名無實之綜合大學，倒不如若有幾個設備充實，素質較高的單科大學來得好」為由，拒絕了省立工學院改制為大學的申請。¹⁰³臨時省議會大會在3月10日仍是通過了請政府將省立工學院改為大學之議

¹⁰¹ 《聯合報》，1965年12月28日，第二版。

¹⁰² 《聯合報》，1954年12月13日，第三版。

¹⁰³ 《聯合報》，1955年3月8日，第三版。

案，¹⁰⁴但同月 24 日，教育部長張其昀在立法院教育委員會中再度表明「目前除師範學院改爲師範大學外，教育部並未考慮任何學院之要求改大學」，否決了省議會的提案。¹⁰⁵

儘管工學院改制爲大學一事屢屢遭挫，但省政府還是展開了增加工學院校系的工作，以爲將來改制大學做準備。由於原先的工學院校無法滿足擴增校系後的校地需求，省教育廳於是考慮將省立工學院附設工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臺南工院附工）遷置他處，讓臺南工院附工原有的建物作爲新系的校舍使用。原先的計畫是將臺南工院附工合併到省立臺南工職學校，但因臺南工職已有 28 班，教室和設備，都無法擴充，因而予以婉拒。消息傳出後，臺南縣人士開始極力爭取要將臺南附工遷至南縣，胡丙申議員前往省府，要求把附工搬到南縣麻豆或新營去。省府卻認爲臺南縣是個農業縣分，不宜設置工業學校，臺南縣遂而落空。

高雄市政府對於附工學校，也大感興趣。在南縣爭取未成後，便主動發動攻勢，向省方提出兩項建校條件：（一）高市負擔建校經費一百萬元；（二）高市無條件提供學校所需用地。高雄市府的建議，讓省府大爲心動。但在臺南市方面，認爲附工職業學校，從日治時代即創辦，向來都是提供臺南縣市國校及初中畢業生升學機會的學校之一，遷若遷移至高雄市，無啻是增加臺南地區青年失學的機會，不肯輕易同意。¹⁰⁶於是一所職業學校讓南部兩大省轄市陷入相爭的局面。最後，省府決定將臺南工院附工遷移高市，成立「省

¹⁰⁴ 當時省議會除了要求將省立工學院在 1955 年改制爲成功大學外，另外亦要求將省立農學院在 1956 年改制爲中正大學。《聯合報》，1955 年 3 月 11 日，第三版。

¹⁰⁵ 《聯合報》，1955 年 3 月 25 日，第三版。

¹⁰⁶ 《聯合報》，1955 年 5 月 23 日，第五版。

立高雄第二工業學校」，但僅補助經費 20 萬元，不足部分由市府自籌。高雄市府為迎接這所學校的入駐，編列預算在西甲工廠區附近招標興建校舍，俾利學生實習。¹⁰⁷

這段爭奪臺南工院附工的插曲雖會造成南、高兩市間短暫的不快，但所幸並未妨礙南部各縣市聯合爭取省立工學院升格為大學的行動。經南部各縣市省議員一再向教育部、省政府陳情的結果，終於在 1956 年（民國 45 年）獲得張其昀教育部長、嚴家淦省主席的同意，於同年 10 月正式升格為「省立成功大學」，設立文、理工、商三學院。¹⁰⁸此為繼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後，臺灣地區的第四所，也是臺北縣市之外唯一的一所公立綜合大學。¹⁰⁹

成功大學建校之後，隨著校系、師生數目的不斷增加，除原有的成功校區、勝利校區之外，再增闢光復校區，¹¹⁰但顯然仍不敷使用。1970 年（民國 59 年）該校向高雄縣表示有意在澄清湖畔設置高雄校區，希望捐贈公地 30 公頃。高屏 3 縣市表示熱烈歡迎，經討論後，計畫由高雄縣政府負責提供校地，而建校所需經費 2,000 萬元，則由高雄市政府贈與 1,500 萬元，屏東縣政府 500 萬元。¹¹¹成功大學與 3 縣市政府經過幾番討論，也很快地建立了以下兩點共識：第一、高雄學區將設夜間部，提供高雄縣市失學青年有深造機會。第二、成功大學在該校區，需盡可能雇用高屏地區方人才從事教育及事務工

¹⁰⁷ 《聯合報》，1955 年 6 月 1 日，第三版。

¹⁰⁸ 1971 年再改制為「國立成功大學」。

¹⁰⁹ 當時清華大學雖已復校，但僅設有原子物理研究所。

¹¹⁰ 〈國立成功大學〉網站。網址：<http://www.ncku.edu.tw/ver2006/ch/ncku/intro/history.htm>。

¹¹¹ 《聯合報》，1970 年 12 月 9 日，第七版。

作。¹¹²

在高雄市爭取設校的幾波行動當中，成功大學高雄校區的設立初期看來是最為順利的，不僅省府在一開始即表同意，高屏 3 縣市同意合作出錢出地，成功大學校方的態度亦甚積極。但這計畫後來卻是軋然而止。從筆者掌握的有限資料中，並未能詳知這項設校計畫突然終止的原因。不過當時成功大學與各縣市政府亦都已進入籌備階段，或有可能是在徵收土地時發生阻礙有以致之。

如前所述，成功大學原囑意在澄清湖畔設置高雄校區。澄清湖古稱大埤湖、大貝湖，因富有灌溉之利，附近地區古來即為良田之所在，這樣的情形自至戰後多年仍無改變。1968 年（民國 57 年），私立輔仁大學有意在澄清湖地區設立海洋學院，高雄縣議會決議將該地區 15 公頃土地贈與輔仁大學作為校地使用，但後來因輔仁大學打消建置海洋學院的計畫，縣府遂將這 15 公頃土地轉租給農民耕作，¹¹³由此可知直到 70 年代澄清湖仍有農民在此耕種。1970 年（民國 59 年）成功大學擬設高雄校區時，議會亦曾評估可將該地直接收回轉贈成功大學，以作為第一階段高雄校區設立之校地，另外再保留附近公地 15 公頃，作為成功大學高雄校區發展之用。¹¹⁴如此一來，澄清湖附近土地耕作的農民生計勢必受到影響。1979 年（民國 68 年）原先擇地於澄清湖復校之國立中山大學，在籌備立校徵地的過程中，即因遭受地主強烈反彈，改決定在全為官方土地的西子灣設校。¹¹⁵澄清湖土地徵收困難之情況，或許

¹¹² 《聯合報》，1971 年 2 月 1 日，第七版。

¹¹³ 《聯合報》，1970 年 11 月 13 日，第七版。

¹¹⁴ 《聯合報》，1970 年 12 月 2 日，第七版。

¹¹⁵ 《聯合報》，1979 年 9 月 8 日，第二版。

也是成功大學高雄校區設立未果之因。

(六)、爭取設立私立輔仁大學

1933年(民國22年)天主教聖言會(Society of Divine Word)在北京興辦輔仁大學。1950年(民國39年)10月隨著兩岸政局的變化,中共教育部正式接辦輔仁大學,並在次年7月將輔仁大學併入北京師範大學,自此北京的輔仁大學已名實皆亡。

國民黨政府遷臺後,臺灣及海外許多輔仁大學校友不願見到母校就此湮沒,¹¹⁶遂於1956年(民國45年)7月15日在臺灣成立校友會,發起在臺復校運動,並爭取教廷與聖言會之支持。¹¹⁷當時外交部長葉公超對輔仁大學在臺復校一事甚為關心,除吩咐駐教廷大使謝壽康就復校事宜與教廷進行聯繫外,也在1957年(民國46年)的羅馬之行中,親自與梵蒂岡教廷高級官員表達輔仁大學校友願在臺灣復校的希望,得到了教廷方面正面的回應。¹¹⁸

校友會復校的期望亦獲得聖言會的會士田耕莘樞機主教(1890-1967年)及胡魯士神父(Henry Kroes, 1903-1989年)和聖言會新總會長舒德(John Schutte, 任期1958-1967年)之允諾。由於聖言會評估無力獨自承擔輔仁大學在臺復校之事務,遂將建校之責任託付於于斌總主教(1901-1978年)。于斌曾任北京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對輔仁大學在臺復校一事甚為關心,早自1955年(民國44年)開始,即常提及聖言會應該在臺灣辦理輔仁大學的復校事。于斌又與教育部長張其昀素有私交,且受國民黨政府信任,這些條件

¹¹⁶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頁211-222。

¹¹⁷ 呂慈涵,《至善達仁—善省己身,明達道德與科技》(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2),頁108-110。

¹¹⁸ 《聯合報》,1957年2月6日,第一版。

使得于斌成爲輔仁大學復校過程中的關鍵人物。

輔仁大學在臺復校最大的困難在於如何籌募數以百萬計的龐大捐款。當時的臺灣政局不穩，1958年（民國47年）的八二三砲戰加深了國際間對臺灣的疑慮，造成于斌在海內外徵求捐款時處處碰壁的困境。¹¹⁹但既然輔仁大學在臺復校的計畫獲得了臺灣中央政府及梵蒂岡教廷雙方的支持，無異代表了此項計畫的高度實現性，自然也引起各地朝野的重視。

高雄市朝野人士對輔仁大學復校一事仍然表達了極高的興趣。1958年（民國47年）高雄市議員柯順德建議市府設法爭取這所素負盛名的輔仁大學在高市復校，以提高南部教育水準，發展地方文化。當時市長陳武璋（1957/06/02~1960/06/01）表示，市府對此事已在進行，曾會同副議長汪雨辰向當局申請，願意提供公地建校，但校方至今尚無具體決定，盼民間機關及地方教育人士協同爭取，以達目的。¹²⁰輔仁大學的復校尚未定案前，高雄市政府就已展開行動，態度可謂相當積極。

1959年（民國48年）聖言會首先同意捐款30萬美元資助輔仁大學理學院建築，同年11月，教宗若望廿三世再捐助美金10萬元作爲建校基金。教宗對輔仁大學的支持提高了其他團體對臺灣的信心，大批捐款陸續湧至，于斌總主教總算暫解募款之難題，並告知媒體，教廷決定將該校將設在臺北附近。¹²¹

輔仁大學可能會在臺北附近設校的初步決定顯然並未冷卻其他各縣市的熱情，北至基隆、南至高雄，東部的宜蘭、花蓮都紛紛向于斌提出設校計畫。

¹¹⁹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212-217。

¹²⁰ 《聯合報》，1958年12月12日，第三版。

¹²¹ 《聯合報》，1959年11月12日，第三版。

一份份真摯的邀約讓于斌難以拒絕，遂於 1960 年（民國 49 年）1、2 月展開勘查校地之旅，前往臺中、新竹及南部、東部尋找合適的校址，¹²²並選中了臺北士林鎮與高雄大貝湖作為可能之校址。是年 3 月 1 日，聖言會田耕莘樞機抵達臺北，就任臺北教區的署理總主教，並擔任輔仁大學新董事會的董事長。不久，耶穌會也加入了輔仁大學的建校事業。兩修會為維持獨立地位，遂於 7 月 7 日的第二次董事會議決定通過「分地設校」原則，決定由中國聖職單位負責文學院，在臺北士林復校；耶穌會負責法學院和工學院，聖言會負責理學院及外語各系，二者皆在高雄大貝湖附近復校。¹²³

這次的輔仁大學高雄校區的計畫雖然還是仰賴高雄朝野捐地支持，但因为有了教廷出面，世界各地教友紛紛慷慨解囊提供建校資金，不再需要高屏 3 縣市獨立負擔龐大的建校經費，比起過去爭取過的大學設校條件更為優渥。1961 年（民國 50 年）初，省政府也公開表示支持，同意「撥公地 43 甲及新台幣 150 萬元作為協助輔仁大學在臺復校建校之用，並同時表示輔大如有需要省府在其他方面的協助時，省府亦極樂於為之。」同年 3 月 10、12 日高雄市政府主任秘書陳新安、高雄縣長余登發等人兩度與于斌商談建校事宜，3 月 27 日由省府公開贈地。于斌在 5 月 29 日一封至聖言會會士蔣百鍊（Richard Arens）的信中提到：輔仁大學復校一事至此「土地問題以完全解決，所有手續也都已確定。」¹²⁴

但在萬事看似風平浪順時，問題卻出現了。大貝湖的土地雖然贈與了輔

¹²² 《聯合報》，1960 年 2 月 1 日，第四版。

¹²³ 呂慈涵，《至善達仁—善省己身，明達道德與科技》，頁 110-111。但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 223 卻記載，聖言會負責理工學院，商學院與外語學院由耶穌會負責。

¹²⁴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 224。

仁大學，但地上所有物補償費用卻是無人願意承擔。高雄縣政府自認已經負擔了捐地的責任，再要求其負擔補償費並不合理；屏東縣府認為大貝湖離屏東較遠，建校對其利益不大，願意分擔 4、50 萬已是極限；高雄市政府則承諾出資 100 萬，不肯再多攤補償費。¹²⁵就在 3 縣市相互推託責任的結果，輔仁大學大貝湖校區的計畫迫告停滯。

輔仁大學董事會一員，原津沽大學校長劉迺仁本就不同意在大貝湖設立分校一事，他認為高雄太遠，僅有高雄醫學院一所大專院校，不易請到合格教員，力勸兩修會成員放棄在高雄建立分校的想法。1961 年（民國 50 年）9、10 月在大貝湖徵地一事受阻之後，聖言會、耶穌會共同要求政府保證解決所有地上所有物，現在及未來可能的賠償問題，同時要求政府興建校區的聯外道路，「如政府不能在 1961 年 12 月 1 日履行上述要求，大學將自動解除所有有關大貝湖校區的義務。」1962 年（民國 51 年）6 月，高雄縣長余登發等人再為設校一事來見于斌，但雙方仍未能達成協議。¹²⁶中國聖職單位、耶穌會單位及聖言會單位乃重新決定在同一校區設校，1963 年（民國 52 年）2 月購妥臺北縣新莊 30 餘甲土地作為大學地址，隨即於 3 月分別興建文、理、法 3 院教室及學生宿舍大樓 5 棟。¹²⁷

雖然劉迺仁不看好在高雄設立大學的遠景，但為了輔仁大學多次來到高雄的于斌顯然有不同的看法。1962 年（民國 51 年），于斌與余登發等人會面之後，曾賦詩一首紀念其事：「高縣官民獻地虔，孰知好事竟多難，將來如設

¹²⁵ 《聯合報》，1962 年 1 月 24 日，第二版。

¹²⁶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 224-231。

¹²⁷ 呂慈涵，《至善達仁－善省己身，明達道德與科技》，頁 111-112。

農學院，盛情不忘看來年。」¹²⁸顯示了雙方雖未能獲致共識，但都感受到彼此的誠意，未能合作深以為憾，並為日後輔仁大學回到高雄設校埋下伏筆。

1967年（民國56年），輔仁大學籌設海洋學院的計畫逐漸成形，于斌於1968年（民國57年）1月11日前往高雄縣小港鄉視察建地，在鳳鳴村覓得數十甲可闢為校地的臺糖蔗地。在前後兩任高雄市長陳啓川（1960/06/02~1968/06/01）、王玉雲的邀宴中，陳、王二人告知澄清湖之地仍可為輔仁大學使用，在宴席上3人立即組成了輔仁大學海洋學院高雄校區建地籌置委員會，縣府並同意撥用澄清湖畔15公頃的土地作為輔仁大學建校之用。遺憾的是，阻力再度發生，這次是發生在輔仁大學校內。聖言會、耶穌會認為于斌並未事先與兩修會商議增設海洋學院事宜，且懷疑經費的來源，所以輔仁大學董事會遲遲不肯同意海洋學院設立的申請。¹²⁹澄清湖畔設立大學一事遂再度受挫，高雄縣政府只好收回該地，承租給農民耕種。

私立輔仁大學是在戰後高雄市設校運動中，最積極也最有希望在澄清湖風景區設校的一所大學，可惜在前後兩波的設校行動中，第一波受阻於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政府3地政府的本位主義，第二波又因輔仁大學內部3教職機構合作又分治的扞格而腰斬。致使多年過去，高雄地區人民心中的理想大學用地—澄清湖，依然盼不到大學入駐。

（七）、爭取設立國立交通大學

1957年（民國46年）國立交通大學決定在臺灣恢復電子研究所，校址設於新竹，1958年（民國47年）正式復校。¹³⁰1964年（民國53年）恢復大

¹²⁸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227。

¹²⁹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頁244。

¹³⁰ 《聯合報》，1958年4月9日，第二版。

學部，¹³¹1967（民國 56 年）設置工學院。¹³²隨著校系的擴張與師生人數的增加，交通大學的校地漸不敷使用，1974 年（民國 63 年）校方開始擬訂計畫，以謀擴充校地或遷校。¹³³高雄市等南部縣市政府人員均認為機不可失，乃於 4 月 30 日會合南部 8 縣市黨政民意首長在高雄市議會成立「國立交通大學南遷促進委員會」，全力爭取交大南遷至高雄。¹³⁴11 月，高雄市籍立法委員張瑞妍在院會中提出早日核定交通大學南遷高雄澄清湖畔之議案，但教育部長蔣彥士表示交通大學遷校問題，還在研究中，尚未做任何決定。¹³⁵1978 年（民國 67 年）國防部同意遷讓陸軍新竹威武營區，交通大學再連同收購附近民地 20 公頃，共計佔地 30 公頃，開闢為光復新校區，順利解決校地問題。¹³⁶南遷高雄之議遂告終止。

（八）、設立國立中山大學

儘管在 1950、60 年代高雄市爭取設立大學的過程歷經多重波折，失敗的淚水多過成功的喜悅，但隨著 60 年代以後因臺灣經濟成長產生的高級人力資源需求，促使臺灣高等教育進入了成長期，高雄市 5 年制的大專院校陸續成立。1963 年（民國 52 年），省立高雄工業職業學校升格為省立高雄工業專科學校；1965 年（民國 54 年），私立高雄商業專科學校成立；1966 年（民國 55 年）私立文藻女子外語專科學校奉准成立；1967 年（民國 56 年）省立水產學校改制為省立高雄海業專科學校，省立女子師範院校亦改制為省立師範

¹³¹ 《聯合報》，1964 年 6 月 12 日，第二版。

¹³² 《聯合報》，1967 年 3 月 19 日，第二版。

¹³³ 〈國立交通大學〉網站。網址：<http://www.nctu.edu.tw/school/history.html>。

¹³⁴ 《高雄市政七年》，頁 779。

¹³⁵ 《聯合報》，1974 年 11 月 3 日，第二版。

¹³⁶ 〈國立交通大學〉網站。網址：<http://www.nctu.edu.tw/school/history.html>。

學院。

從早期高雄市大專院校設立的情形來看，政府在設校議題上大體是有顧及地方特色與需求的，例如高雄醫學院的成立，多少反映了臺灣南部的醫療需求；高雄工專和高雄商專，則是因應高雄工商業發展而產生的人才需求；外語專科學校是因當時工商業界積極向海外拓展貿易，故需要外語方面的人才；高雄海專的出現更是配合了高雄市身為全臺第一大遠洋漁業城市的特色；而為了因應實行 9 年國教後南部地區中學師資需要量將會大增，遂將高雄女師升格為高雄師院。¹³⁷儘管在中央政府在高雄市普設培養職業人才的專科學校及獨立學院，但高雄市民在以高等教育配合經濟發展的教育政策下，還有一個非常迫切的願望，就是希望在高雄市設立一所綜合大學，以滿足高雄市文化建設的需求。高雄市建築師翁金山曾撰文描述高雄市「在一片工商繁榮聲中，唯獨文風欠盛，而在邁進現代化的過程上患上文化的貧血症。輿論界咸認加強發展高等教育為刺激該地區的文化活動，提高文化水準的必然途徑。創辦一所綜合大學，以消除文化沙漠之恥，乃成為地方人士共同努力的目標。」¹³⁸可見當時的高雄市民已將「消除文化沙漠之恥」的願望寄託在綜合大學的設立上。

高雄市文教資源不僅是落後於臺北市。臺北市以外，在當時大學教育機構數量位居臺灣之首的應屬以臺中市為首的中部地區。1956 年（民國 45 年）12 月 1 日省政府由臺北疏遷至中部地區，省府員工隨之遷移，¹³⁹帶動了中部

¹³⁷ 洪泉湖，〈五十年來高雄的高等教育〉，收錄於黃俊傑主編，《高雄歷史文化論集》（三）（高雄，財團法人陳中和翁慈善基金會，1996），頁 348-349。

¹³⁸ 翁金山建築事務所，〈高雄大學長期發展計畫〉，《建築師》第 3 卷第 2 期（第 26 期）1977 年 2 月，頁 54。

¹³⁹ 《臺灣光復四十五週年專輯：索引篇》（臺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90），頁 42。

地區的發展，也促使已醞釀多年將省立農學院改制為大學的計劃得以付諸實現。¹⁴⁰1959年（民國48年）5月，省府開始計畫在中興新村設立一所省立大學，以配合疏遷計畫¹⁴¹。1960年（民國49年）12月行政院核准此項計劃。¹⁴²1961年（民國50年）1月，位於臺中的臺灣省立農學院增設理工學院，並合併臺北的法商學院改制為中興大學，共有農、法商、理工、等學院，成為一所綜合大學。1980（民國69年）私立逢甲工商學院升格為逢甲大學。¹⁴³再加上1955年（民國44年）已成立的私立東海大學。所以在高雄市第一所綜合大學—國立中山大學成立之前，臺中地區已擁有3所綜合大學，其高等教育之資源雖仍遠不及臺北，但足以將臺灣第二大城—高雄市遠拋在後。

即使單就南部地區而言，高雄市在文教方面的建設也絕非為南部之首。自日治時期，高雄建港以來，興盛的工商發展，使得高雄市成為漩渦中心，不斷地吸引外來人口的移入，其中以澎湖、臺南移民最多，高雄市成為這些外地人口的第二故鄉。¹⁴⁴也因為這些移民的入駐，使得高雄市身為臺灣第二大城的地位長久不墜。在1945年（民國34年）全市13萬之人口，至1976年（民國65年）已突破100萬大關，¹⁴⁵這其中除了人口的自然增加之外，社會增加居高不下更為主因。¹⁴⁶但在中央政府與省府的計劃中，高雄市向被定

¹⁴⁰ 《聯合報》，1956年3月17日，第三版：「臺中省立農學院將於明年改為大學，並獲得有關機關及教育部長之默許。同時，省府將疏散至中部，佔有天時、地利之便，改為大學當無問題。……至改大之名稱，將定為中正大學。」

¹⁴¹ 《聯合報》，1959年5月18日，第三版。

¹⁴² 《聯合報》，1960年12月7日，第二版。

¹⁴³ 《聯合報》，1980年3月7日，第二版。逢甲工商學院成立於1968年。

¹⁴⁴ 林朝號 總編，《海洋首都·國際高雄：總統府地方文化展》（高雄，高雄市立中正文化管理處，2002），頁83。

¹⁴⁵ 《高雄市政七年》，頁787。

¹⁴⁶ 社會增加意指該地移入人口多於移出人口之數。高雄從日治時代末期社會增加率即超越了自然增加率，而戰後至在1970年代以前，年平均社會成長率均在10%以上，70年代之後

位為工商業大城，即使設立高等教育機構，都以培養有利經濟發展的專業人才之大專院校及獨立學院為主。而另一個南部城市，素有文化古都之稱的臺南市，則似乎比高雄市更適宜成為南部的文教首善地區。從日治以來，南部地區就有出現文教資源向臺南集中，工商建設向高雄集中的趨勢。日治時代的師範學校、高等工業學校皆設於臺南，戰後南部的第一所綜合大學位在臺南市，南區之省立社教館亦落址臺南市。¹⁴⁷相反地；只要是大型的工業設施，則多集中於高雄市，日治時代的煉油廠、軋鋼廠、肥料工廠、硫酸鋁廠、化學工業廠、煉鋁廠等；戰後中央政府接收高雄的工業設施繼續擴廠經營，並在十大建設時期陸續在高雄市成立大造船廠、大煉鋼廠，並發展石化工業，高雄市成為臺灣的重工業之城。相反地，當 1957 年（民國 46 年）臺南市爭取設立工業區時，省主席周至柔卻駁回了這項要求，他認為臺南市身為民族英雄鄭成功根據地，臺灣首座孔廟設立之地，應以發揚光榮的歷史為使命，今後的建設目標，應朝向文化與漁業途徑發展，如果要將臺南市建設成一個工業都市，那是非常不智的。¹⁴⁸由此可知，戰後初期的省府在南部兩大省轄市高雄、臺南兩市發展規劃方面，似有「工商」、「文教」分流的傾向。

1970 年代末期，南部地區的快速發展，終於引起了政府與學者的注意，教育資源缺乏的情形亦逐漸獲得重視。1978 年（民國 67 年）10 月 3 日，行政院為肆應南部地區的迅速發展需要，決定設立專科以上的高等學府一所，

則成長趨緩。陳震東，《高雄市人口變遷之研究》，頁 21-43。

¹⁴⁷ 1953 年省教育廳擬定設立社會教育館省方計畫。全省預定分為東、南、北、中四區成立四所省立社會教育館。其中南區社教館位於臺南，東區社教館位於台東，中區社教館位於台中，北區社教館位於臺北。

¹⁴⁸ 《聯合報》，1957 年 12 月 6 日，第三版。

但一時並不確定要設立大學抑或專科學校。¹⁴⁹11月，行政院終於決定要設立大學，並開始勘查校地，預定參加1979年（民國68年）的大學聯招。¹⁵⁰但由於1978年底中美斷交，國內局勢不穩，加上南部各縣市爭取設校動作不斷，以致籌備工作進度緩慢。¹⁵¹到了1979年中，教育部表示要以中山大學復校的方式來籌辦此所南部大學，並聘請李煥出任中山大學籌備委員主任委員。¹⁵²

國立中山大學前身為孫中山於1924年（民國13年）創立之廣東大學，1926年（民國15年）7月改名為中山大學，設校於廣州市近郊。1949年（民國38年）中共政權建立，國立中山大學不克隨國民黨政府播遷來臺。¹⁵³1964年（民國53年）教育部即有意讓中山大學復校，¹⁵⁴消息經報刊披露，南投、高雄兩縣議會均有爭取設校的動議。¹⁵⁵同年年底，再度傳出「國立中山大學決定在臺復校，先辦研究所，設校地點，將在臺北、高雄、彰化三地選擇，彰化願撥贈八卦山公地作為該校校地，高雄市也願意贈撥壽山土地」的消息，¹⁵⁶但中山大學的復校始卻終停留在「只聞樓梯響」，未見實際行動。隨著70年代以後，高等教育進入整頓與停滯時期，中山大學的復校之日更是遙遙無期。1979年，中央政府終於決定在南部辦一所大學。一開始關於該所大學的名稱有諸多討論，其中又以中正大學的呼聲最高，但最後中央決定以中山大

¹⁴⁹ 《聯合報》，1978年10月4日，第二版。

¹⁵⁰ 《聯合報》，1978年11月13日，第二版。

¹⁵¹ 《聯合報》，1979年1月19日，第二版。

¹⁵² 《聯合報》，1979年6月6日，第二版。

¹⁵³ 謝家林，〈國立中山大學之復校與本市文化之提升〉，《高雄文獻》第24、25期合刊，1986年1月，頁105。

¹⁵⁴ 《聯合報》，1964年11月12日，第二版。

¹⁵⁵ 《聯合報》，1964年12月16日，第三版。

¹⁵⁶ 《聯合報》，1964年12月29日，第二版。

學為新校校名，一方面完成中山大學校友多年來的復校願望，一方面在文教資源貧瘠多年的南部地區注入一股活水。

校名決定之後，中央政府接下來要苦惱的便是新校座落何處的問題。一如往例，南部諸多縣市都表明了爭取該校的意願，也提供了設校用地的資料。但中央認為這些土地因地勢、環境及地上物佔有等問題，都不很理想，籌備處設立的時間也一延再延。1979年（民國68年）7月，教育部決定在高雄澄清湖畔復校，校地預定為100公頃。¹⁵⁷但一開始進行徵收土地後，就發現困難重重，當地地主反抗激烈。8月3日，教育部將籌建中山大學進行情形向當時的總統蔣經國提出簡報，蔣經國認為高雄市西子灣背山面海，風景壯麗，且與市廛相隔，是個求學的好環境，於是校址終告定案。¹⁵⁸9月，籌備處主任李煥與教育部次長施啟揚在高雄市召開記者會，發表書面聲明表示：中山大學建校用地，初步選定高雄澄清湖畔大學用地後，今年7月1日成立籌備處，積極進行校地規劃，預定明年6月參加大學聯招。近數月來，澄清湖旁土地所有權人聯名向教育部等機關請願，反對徵收土地，建議多使用公地。經教育部與籌備處及有關人士多次審慎研商，為維護土地所有人權益，減少地方政府行政上困難，並爭取時效，俾能及時參加明年招生，決定先在西子灣設校，至於澄清湖大學用地仍依原計畫保留為建校用地，四周土地暫不變更都市計畫，並停辦徵收土地。高雄西子灣土地全部為公地，經軍方同意撥用，土地取得容易，建校進度可如期進行，且西子灣依背壽山，面向臺灣海峽，環境幽雅，為理想大學建校場地。¹⁵⁹因此就在總統支持、中央爭取復校

¹⁵⁷ 《聯合報》，1979年7月20日，第二版。

¹⁵⁸ 康炎村，《國立中山大學建校十週年特刊》（高雄，國立中山大學，1990），頁15。

¹⁵⁹ 《聯合報》，1979年9月8日，第二版。

時效及高雄縣澄清湖徵地困難的情況下，一所期待已久的綜合大學終於落址在高雄市轄區之內。

綜合大學的設立，是高雄市朝野數十年來的心願。1970年（民國59年）爲了早日促成長期受軍事管制的壽山擴大開放，市府就曾建議將壽山公園山頂設置「高雄大學」，但當時教育部未給予正面的回覆。¹⁶⁰如今中央首肯在壽山山麓、西子灣畔設立一所綜合大學，市民無不歡欣雀躍。因爲有了這樣一所綜合大學，高雄芸芸學子就有了就近就學與進修的管道，更重要的是。高雄市民虔心期盼這樣的一所綜合大學能負起文化上振衰啓弊之效，將「文化沙漠」變成「文化綠洲」，成爲南部地區人文薈萃之所，往來儘是德高博學之鴻儒。¹⁶¹

1980年（民國69年）7月，國立中山大學成立。建校之初，僅設系所，尚無學院編制，校舍亦相當簡陋，其後逐漸擴展。1984年（民國73年）8月奉准成立文理、工、管理三學院，成爲名正言順的綜合大學。由於校址遠離臺北市，立校最初即面臨優良師資何處來的難題。爲了解決此一難題，校方在國內一一登門懇切禮聘理想人選外，並且專程遠赴國外物色延攬，並加強教師生活福利，例如：（1）在校舍尙未全面興工以前，即選擇市內交通便利地區購置了大批夠水準的教師宿舍，在校舍興工以後，不但逐步興建教師宿舍，而且廣建教授研究室，以利教師課餘潛修。（2）居住北部的教師由學校供應每週定期往返北高的交通車輛，必要時提供車票或機票，以利行程。（3）成立學術研究基金，補助教師研究及出國進修，並藉以改善教師待遇。（4）

¹⁶⁰ 《聯合報》，1970年11月16日，第七版。

¹⁶¹ 謝家林，〈國立中山大學之復校與本市文化之提升〉，《高雄文獻》第24、25期合刊，頁106。

成立教師托兒所，減輕尚有幼兒的教師後顧之勞。以上這些措施，對於延攬優良師資任教有相當助益。所以當開學之初，中山大學 70 多位專任教師中，具有博士學位的竟超過 50 人，百分比之高，在各大學之中都很少見。¹⁶²

事實上，中山大學將於西子灣復校的消息傳出後，高雄市也有不少疑慮的聲音。主要是因為自 1975 年（民國 64 年）8 月後，高雄市政府陸續投下 4 億經費，積極開發面積廣達 60 公頃的西子灣風景區，先後完成蔣公行館紀念特區、海濱公園、海水浴場、動物園、花園廣場、大門售票牌樓、椰子林區等工程。在 1977 年（民國 66 年）正式對外開放，¹⁶³並委由在民間企業經營。

西子灣富有濃厚的大自然閒適成分。道路旁兩排整齊高聳的椰林富有獨特的南國風味；佇立西子灣口，可以看到大商輪鳴著輪笛在視野中淡出復淡入的場景，尤其黃昏時分，落日染紅天際線，這樣的景色讓民眾愛不釋手，遠道前來的遊客絡繹不絕。¹⁶⁴1978 年（民國 67 年）3 月 29 日全國第一屆青年杯帆船錦標賽在西子灣舉行，前來參觀的遊客擠滿了青山半圍的西子灣海水浴場。¹⁶⁵

但爲了中山大學的設立，高雄市政府只好停止了後續的西子灣開發工程，並將原西子灣風景區部分設施，如動物園、海水浴場等搬遷或撥用，並配合大學設校而興建各項公共設施工程，如道路開闢，排水設施，水土保持及校區內舊有違建之處理等。¹⁶⁶此外，由於軍方不同意開放所有壽山地區，

¹⁶² 康炎村，〈國立中山大學建校十週年特刊〉，頁 19。

¹⁶³ 蔣忠益、曾玉昆 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九·文化志·文獻、名勝古蹟篇〉，頁 159-160。

¹⁶⁴ 《聯合報》，1979 年 3 月 3 日，第九版。

¹⁶⁵ 《聯合報》，1979 年 3 月 29 日，第八版。

¹⁶⁶ 謝家林，〈國立中山大學之復校與本市文化之提升〉，《高雄文獻》第 24、25 期合刊，頁

爲了讓中山大學有足夠的發展空間，開山填海勢在必行。於是中山大學的第三期工程中，將原屬於海水浴場附近面積達 6.6 公頃的海灘填平，海水浴場面積因而大減，遊客也走了一大半。¹⁶⁷一首發表在中山大學設立前夕的詩作〈冬之西子灣〉，歌頌了西子灣冬季之美，彷彿也在預告西子灣美景將由絢爛走向平淡：

冬之西子灣／沒有弄潮兒／潮在冷烟中卷舒
鐵椅堆集／遮陽傘沈睡／如蝴蝶的彩衣消失
狹長的防波堤／從椰子林中伸出／繫晚歸的漁船
蒼茫外海／有巨艦的星星燈火／在海天勻淨處沈澱¹⁶⁸

但掃除「文化沙漠」，提昇高雄市的文化建設，是更多高雄市民共同的期望，這股殷切的期望曾驅使了高雄人數十年來爲爭取設立大學付出持之以恆的不懈努力。當中央政府終於首肯，多年的辛苦有了回應，多數的高雄市民恐怕不願意放棄得來不易的成果—第一所綜合大學。而中山大學成立後，在高雄市舉辦重要學術研討會較以往有顯著增加，有志青年因得助於中山大學的近水樓台，提供了許多進修機會，也提升了進修風氣。也因爲高雄市有了一所最高學府，可以羅致國內外學者專家來高雄市落籍生根，傳授知能。¹⁶⁹若此人具有高度知名度，對於提升高雄市的藝文形象，則有更助益，余光中就是其中一例。

1985 年（民國 74 年）9 月，中山大學首任校長李煥爲提高中山大學知名

104。

¹⁶⁷ 曾玉昆，〈灣尋西子別忘歸〉，《高雄畫刊》第 10 卷第 3 期，1989 年 3 月），頁 13。

¹⁶⁸ 《聯合報》，1980 年 3 月 18 日，第八版。

¹⁶⁹ 謝家林，〈國立中山大學之復校與本市文化之提升〉，《高雄文獻》第 24、25 期合刊，頁 106。

度，力邀名詩人余光中前來任教，並擔任文學院院長兼外文研究所所長。余光中於是結束了他在香港中文大學十多年的執教生涯，來到了高雄市。¹⁷⁰余光中的選擇一度讓臺北的親友不解，責怪他放棄了昔日曾經留居、人文薈萃的臺北，卻來到人生地不熟、遠在邊陲的高雄市。為此，余光中寫下了〈海是鄰居〉一詩，娓娓道出高雄市引人入勝之處：

為什麼老遠一個人／要搬來南部定居呢／每一提起／臺北的朋友就
會有／怪我的語氣
為了一個鄰居，我說／為了他豪爽的性格／住在他的隔壁／一點也
不覺得擠／他浩藍的眼神只要／偶然一瞥／就忘了圍困的市區
他最會無中生有了／變出許多條船來／還會趁你不留意／一條又一
條／把軸艙都收了回去／全憑一根／水平線的玄虛。
他會說水手的方言／唇音輕柔／喉音深厚／在一切港口都通行／最
愛看起風的日子／他怎樣跟岩石／激昂地辯論。
他龐大的家族，錨說／都住在地下宮裡／一層比一層／更深邃也更
神秘／都要戴上潛水鏡才能／窺探他庫藏的／啊，無盡珍奇。
我不敢敲他的水門／更不敢進他的寢宮／怕他突然醒來／發起藍色
的脾氣／趁此刻他睡著／把他的鼾聲／驚人的肺活量啊。
裁在一截限時信裡／多麼動聽的單調／寄給北部／那幾隻可惜／聽
不見潮水的耳朵。¹⁷¹

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辦公室位在文學院 4 樓，從窗外望去，就可以看

¹⁷⁰ 傅孟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傳》（臺北，天下遠見出版社，1999），頁 195-199。

¹⁷¹ 余光中，〈海是鄰居〉，收錄於余光中，《五行無阻》（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頁 25-29。

到海洋。愛海的余光中就常常坐在辦公室窗前，眺望著西子灣的水平線、海浪、落日與船帆，寫下了諸多美麗的篇章。他說：

在這一片鹹水裡下錨的舢舨巨舟曾經漂泊過各國的名港。高雄，
正是當代的揚州。¹⁷²

有了前人的披荆斬棘，今日的中山大學的師生們，終可以在碧波萬頃、水天相接的美景中鑽研著高深的學問。國立中山大學－這一所依傍著西子灣，東毗壽山，西臨臺灣海峽，南通高雄港的美麗大學，象徵高雄市文化綠洲的萌芽，也蘊含了戰後初期高雄市民無窮的文化希望。

¹⁷² 余光中，〈綠海〉，收錄於余光中，《隔水呼渡》（臺北：九歌出版社，1990），頁 257。